

---

# 憶述活躍的運動家高兩貴： ——高何謙、高銘堂兄弟訪談紀錄

主訪：許雪姬<sup>\*</sup>

記錄：李思儀<sup>\*\*</sup>、薛宏甫<sup>\*\*</sup>、李鎧揚<sup>\*\*</sup>

時間：2017年2月18日

地點：臺北市文山區興隆路高宅

高何謙，1936生、高銘堂1952年生，兄弟在其父高兩貴遷居臺中時出生、求學，本次訪談主述者高銘堂，從臺中一中畢業後考入國立臺灣大學土木系，取得學位後在榮工處海外部估價組服務，1987年進入榮工與中鼎合資之泛亞工程公司擔任經理、副總經理、總經理。2012年退休並擔任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兼任申訴審議委員至今，現亦受邀擔任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執行長。

高兩貴(1907-1981)，臺北市人，日治時期在臺北先後參與「臺北青年體育會」、「臺灣黑色青年聯盟」等社會運動，結識同樣活躍於大稻

---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曾任臺灣口述歷史學會第三屆理事長

\*\*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助理

埕的翁澤生、洪朝宗等人，卻也因此與奧運選手培訓機會失之交臂，之後於1927年六一七事件全島大檢肅時被捕入獄。出社會後任職於電通社，擔任「通信配達夫」（新聞配送員）一職，後調至臺中支部，遷居臺中，同時與社會中下層群眾關係良好。戰後初期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盡己之力維持社會秩序，事件後卻被警方追捕，展開逃亡，靠友人相助倖免於難。爾後威權時期無法逃離當局的監視，然仍不改其志，關心社會、政治，其住處成爲早期中部地區黨外人士聚集論政之所，他的一生可謂臺灣左翼社會運動的發軔與戰後黨外運動的先驅。

## 一、父親的家庭與教育背景

我們的父親<sup>1</sup>是高兩貴，1907年出生於臺北市蓬萊町。祖父高金榜，原先住在臺北木柵阿泉坑，後搬至田寮仔居住，在靜修女中、文萌樓<sup>2</sup>附近一帶賣菜維生。祖父共生六子，長子高兩焱（後改名高炎），二子高兩生，老三高兩貴，老四高何土，<sup>3</sup>老五高

- 1 此次因緣際會，得以訪問到高兩貴的兩位兒子，亦爲他們的父親留下珍貴的歷史紀錄，同時由於訪談當天主要由高銘堂先生口述，其兄高何謙僅陪同、確認事實，因此下文以第一人稱的高銘堂做紀錄，高何謙補充時另起補述內容之段落。
- 2 文萌樓位於臺北市大同區，爲著名之「公娼館」，設立於1925年，2005年由臺北市政府認定爲直轄市定古蹟。參見〈公告指定「歸綏街文萌樓」爲臺北市市定古蹟〉，《臺北市政府公報》，96年春字第2期，頁15-17。
- 3 高何土（1907-2004），臺北人，幼時受三哥高兩貴影響，對體育活動有濃厚興趣。1923年利用「臺北青年體育會」取得的場地練習田徑。1927年成立擔任「北星田徑隊」隊長，1929年於大稻埕青年團擔任體育部長。同年《臺灣日日新報》舉辦五州競走大會，代表臺北州參加並取得冠軍。

兩旺，老六高六龍。父親先與吳氏乞巧結婚，並沒有生育子女，後得弟弟高何土將他其中一子高何謙<sup>4</sup>過繼給他，又另收養一女。吳氏 1944 年過世，父親續弦吳燕女士（家母），才陸續生我和我的四個兄弟姊妹。高何土受到父親參加「竹篙跳」（tek-ko-thiàu，撐竿跳）、跳遠比賽得到優勝的影響，也開始田徑活動，後來參加馬拉松比賽，第一屆省運時舉聖火入場。高六龍<sup>5</sup>曾當選臺北市議員，他的女兒高惠子<sup>6</sup>也曾經當選臺北市議員。父親在 1928 年黑色青年事件被關了 8 個半月後，被服務的電通社調到臺中，直到戰後發生二二八事件之後才結束在臺中的事業，1948 年再舉家搬回臺北，所以我是在陳祖厝（陳德星堂）對面重

---

戰後出任首屆臺北市體育會理事長，並於首屆臺灣省運動會上舉聖火。1952 年參與臺灣省田徑協會，策劃與菲律賓進行體育交流活動。1984 年田徑運動人士為表彰其貢獻，舉行「高何土盃田徑公開賽」。參見雷寅雄訪問、紀錄，〈臺灣田徑之神—高何土〉，收入曾瑞成編輯，《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臺北：臺灣身體文化學會，2006），頁 21-33。

- 4 高何謙，1936 年生，過繼給伯父高兩貴，二二八事件前就讀臺中師專附小，數年後到臺北，與生父高何土同住，當時高何土為臺北市議員。高何謙亦受高兩貴、高何土影響，從事田徑運動，曾得省運 100 公尺徑賽金牌。
- 5 高六龍，1921 年生，戰後當選第四至六屆省轄市臺北市議會議員，臺北市臨時市議會第一屆議員。
- 6 高惠子，1943 年生，臺北人，臺灣省立體育專科學校三年制畢業，在臺北市改制為直轄市後當選第一至五屆市議員。市議員卸任後擔任臺北市體育會理事。〈捐款「笑」果足〉，《聯合報》，1999 年 11 月 19 日，第 18 版；〈蟬聯者滿懷興奮 離職者依依難捨 議會惜別餐會百感交集〉，《聯合報》，1989 年 12 月 24 日，第 13 版；臺北市議會歷任議員介紹，網址：[http://www.tcc.gov.tw/iFrame.aspx?n=26921E80F6DC89B5&url2=Councilor\\_Content\\_All.aspx?s=1354%5Ed=431217%5En=%E9%AB%98%E6%83%A0%E5%AD%90](http://www.tcc.gov.tw/iFrame.aspx?n=26921E80F6DC89B5&url2=Councilor_Content_All.aspx?s=1354%5Ed=431217%5En=%E9%AB%98%E6%83%A0%E5%AD%90)，（2017 年 5 月 8 日查檢）。

慶北路的巷子裡，向許尚文先生租的房子出生的。

父親就讀太平公學校，和日治時期從事社會運動出名的翁澤生、<sup>7</sup>洪朝宗、<sup>8</sup>胡柳生、<sup>9</sup>白成枝<sup>10</sup>等人都是同學，王萬

- 7 翁澤生(1903-1939)，臺北大稻埕人，1921年參與初成立之臺灣文化協會，同年冬就讀廈門集美中學。1922年返臺參加太平公學校同窗會，席中要求自治之發言受警察注意。1925年加入共產黨。1928年和謝雪紅等人共同成立臺灣共產黨。1930年底因臺共東京支部受破壞，翁澤生和謝雪紅間展開路線之爭，翁成爲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的工作人員，是臺灣與該組織唯一的聯繫管道。翁後來說服該機構派遣密使來臺灣活動，剝奪謝雪紅的權力，但雙方鬥爭不久後，臺共在1931年底遭到破壞。翁先回到中國擔任共黨兩廣中央巡視員，1932年赴上海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秘書長。1933年遭逮捕，後引渡回臺灣。參見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不能遺忘的名單：臺灣抗日英雄榜》（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1），頁89-106；何池，《翁澤生傳》（臺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頁167-168；郭杰、白安娜著，李隨安、陳進盛譯，《臺灣共產主義運動與共產國際（1924-1932）研究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0），141-147。
- 8 洪朝宗(1906-?)，臺北大稻埕人，就讀淡水中學時遭退學，先後入廈門集美中學、中華中學就讀，畢業後進入上海大學。1927年與高兩貴等人因臺灣黑色聯盟事件遭逮捕，入獄達四個多月。1928年4月臺灣共產黨成立時負責青年部與婦女部之職務。1931年9月於臺灣又遭逮捕。參見黃師樵，《臺灣共產黨秘史：臺灣史上的第一面紅旗》（臺北：海峽學術出版，1999），頁45-46。
- 9 胡柳生，1906年生，臺北人，太平公學校畢業後，前往廈門中華學校就讀。與高兩貴等人組織臺北青年會，遭禁止後另組「臺北青年體育會」。1926年和高兩貴、洪朝宗等人在「始政紀念日」舉行演說會，後分別遭官方處以罰金、拘留刑。在臺灣文化協會左傾以後，與連溫卿等人策劃組織勞動團體，1928年7月於臺北市永樂町舉行臺灣勞動運動統一聯盟，與連溫卿代表臺灣自由勞動者聯盟出席會議。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臺北：南天書局，1995），本書爲1937年復刻版，以下同，頁187、883、886、1270；參見日治法院檔案，臺北地院，刑事判決原本，大正15年第10冊10月，第166頁。
- 10 白成枝，1898年生，又名黃白成枝。1924年與高兩貴、胡柳生等人參與反對大稻埕慈聖宮建醮鋪張浪費的演講活動，後陸續參加臺灣文化協

得<sup>11</sup>似乎早他們幾班。公學校畢業後，父親的許多同學如潘欽

會、臺灣民眾黨、臺灣工友總聯盟與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曾擔任臺北魚商書記，廈門《全閩日報》記者。一度與王萬得等人於1930年6月22日創刊《伍人報》，該雜誌一度改稱《工農先鋒》，最後因資金困難無法經營，乃與楊克培的「臺灣戰線社」合併，但不久便結束。1944年任廈門市政府秘書處囑託，戰後被金廈肅奸會拘捕，送廈門高一分院。回臺後參與蔣渭川的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二二八事件期間任處理委員會委員，曾提出「國府軍隊繳械」之要求，警總呈報其在事件期間演講煽動叛亂及組織武裝隊伍，事後未被追究。之後改經營醫療器材，曾任香蕉公會理事，參與編輯《蔣渭水合集》。參見王詩琅譯，《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臺北：稻鄉出版社，1988），頁184；許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頁109；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數位典藏，〈1905年7-9月外國旅行券下付表及返納表〉（T1011\_02\_019），〈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及返納表〉（T1011）、〈1927年4-6月外國旅券下付表〉（T1011\_03\_113），〈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及返納表〉（T1011）。

- 11 王萬得(1909-1985)，臺北大稻埕人，1918年大稻埕公學校畢業，進入總督府遞信部通信練習所甲科，翌年9月畢業以「通信事務員」陸續就職於新營、淡水、臺北郵政局。1922年辭職，加入臺灣文化協會，擔任《臺灣民報》事務員。1927年退社，轉往中國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起在南京活動。在印度人「藍辛」介紹之下轉籍臺灣共產黨。1930年在共產國際指導下，企圖聯絡蘇新、蕭來福等人組成改革同盟。他在1931年參加於臺北召開臺灣共產黨改革同盟創立大會，4月間在共產國際指導下提出臺共政治綱領。同年5月底至6月初在八里庄召開臺共第二次大會，被選為中央常任委員兼書記，但隨即於7月17日遭逮捕，判刑13年，1942年出獄。戰後1946年任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常務理事，翌年與潘欽信等人參與二二八事件，事件後被通緝，改名王文德，逃往中國，擔任政務委員及臺灣民主自治同盟顧問。1949年於上海參加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任華東總支部委員。中共建國後擔任臺盟總部理事，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曾遭到批鬥而下放勞改。參見〈縛られながら 大道で演説 王萬得最後の絶叫〉，《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7月25日，號外版；黃師樵，《臺灣共產黨秘史：臺灣史上的第一面紅旗》（臺北市：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頁10、31-32；李盛平編，《中國近現代

信、<sup>12</sup> 蔡孝乾、翁澤生都前往福建廈門唸書。父親也想要求祖父讓他就讀廈門集美中學。當時我們的一位堂伯父高墀英，<sup>13</sup> 因他父親早逝，由祖父照顧他長大，並且助他讀到臺北師範學校，但祖父卻拒絕自己兒子的請求。當時叔叔高何土也在旁邊跪求祖父，祖父無論如何還是不肯。我們猜不單是學費的問題，當時廈門的學費、物價都還算可以支應，去那裡還有獎學金，更有那些左派朋友幫助，根本不會給家中帶來經濟負擔。但可能是家裡需要人手，如果父親留學將少一位可用人力。當時父親的長兄高兩炎要幫忙賣菜，父親自小學五年級開始，每天凌晨四、五點要去

---

人名大辭典》(北京：新華書店總店北京發行所，1989)，頁29；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數位典藏，〈1927年4-6月外國旅券下付表〉(T1011\_03\_113)，〈臺灣總督府旅券下付及返納表〉(T1011)；日治法院檔案，臺北地院，刑事判決原本，昭和17年第4冊4月，第188頁，昭和16年第8692號、昭和17年第506號。

- 12 潘欽信，1908年生，臺北大稻埕人，太平公學校畢業後於《臺灣日日新報》社擔任「植字見習」(實習排字工人)。1922年辭職前往中國，於廈門南國公司擔任工友，該年11月返臺，在某私立齒科醫院擔任文字書寫職務。1924年6月因違反「臺灣違警例」被判處拘役十天時，其職業被記載為「齒科醫見習」。1924年10月前往上海，就讀上海大學附設中學部，1929年在廈門蟬江小學任教，後受邀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返臺，與王萬得、蘇新、蕭來福等人互動密切，出席該年5月於八里召開的臺共第二次大會，獲選為中央委員。因受到警察機關監視，欲在8月間偷渡中國，但於9月1日遭到逮捕。戰後任三民主義青年團臺北分團團長與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會員。二二八事件後潛逃，最後病逝於上海。參見黃師樵，《臺灣共產黨秘史：臺灣史上的第一面紅旗》，頁30-31；日治法院檔案，臺北地院，刑事判決原本大正13年第6冊6月，第73頁，大正13年1888號。
- 13 根據《府報》資料可知，高墀英於1929年取得公學校乙種本科正教員資格。參見《府報》，第650號，1929年4月24日。

太平市場那裏批購豆干，然後擔著豆干回來讓祖父賣。雖然祖父很疼父親，不過他也要幫忙做事。

公學校畢業後，父親進入成淵學校<sup>14</sup>就讀夜間部。1921年畢業後，6月到中川酒店工作。那時電通社<sup>15</sup>的人常來這裡消費，父親因此認識了這些人，後來他們介紹他到電通社工作，開始時是擔任「通信配達夫」（新聞配送員）的職務。



高兩貴（右一）與電通社同仁應酬

- 14 成淵學校設立給當時在臺北城內任職的官民就讀，因白天忙於上班，僅能在夜間到設於南門街的「東門學校」與石街坊的「學習會」進修，但設備相當不全，因此在撫臺街的前砲兵隊處建設新校舍，並合併前述二校，由長尾半平、峽謙齋設立，於1908年4月正式開校。校名由後藤新平所命，其典故出自荀子《勸學篇》：「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戰後一度改名為福星中學，1956年改回原名。參見〈成淵學校の開校式〉，《臺灣日日新報》，1908年4月25日，第2版。
- 15 電通社全名為「日本電報通信社」，以新聞通訊與新聞雜誌廣告代理為主要業務，原先以日本本土為主，1920年來到臺灣，並於臺北市府中街三丁目59番戶設立支局，並發行日刊《日本電報》，其內容涵蓋政治、外交、文化等各種時事。首任支局長由該社大阪支局的董事加藤駿擔任。〈電通支局設置〉，《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12月5日，第7版。

## 二、日本時代在臺北參與社會運動之始

父親之所以會走上社會運動、反對日本人主要是受到環境影響。起因是一次太平公學校的同窗會上，日本校長來參加，卻要求他們要講「國語(日語)」，他們堅持要講臺灣話，與校長、教職員起了很大的衝突。翁澤生、洪朝宗、潘欽信等同學由中國回來時，每次和朋友見面總帶回一些進步、激烈的思想。1924年一次同學會後適逢大稻埕慈聖宮的「做醮」活動，當時社會上景氣不好，大稻埕的生意人想利用慈聖宮的「建成大醮」來刺激消費，要民衆花費每人約二、三十元負擔神明儀式與慶典的費用，這對當時貧苦的民衆負擔很大。<sup>16</sup> 父親和幾個朋友，還有基督教的朋友，很反對生意人利用神明儀式或迷信思想，要民衆出錢。開完同學會後，他們就去破壞醮壇活動，並要求民衆拒絕迷信。當時他們並未用「無產青年會」這樣的名義活動，而是以一群「無產青年」的名義活動，沒有「會」這樣的組織。在他們推動破除迷信的時候，一位在新店尾(今重慶北路一帶)活動，綽號叫「大頭貴」的保正，派了一群人來找父親。他指責父親等人妨礙他，雙方發生一些肢體衝突。大頭貴找兩、三個證人說父親打傷人，其中一位叫吳榮鎰的一直說父親打傷他，害父親被警察拘留一週，後移送地檢署時又被拘留一週。當時被抓的除父親外，還

---

16 大稻埕慈聖宮建造於清咸豐年間，原先位於中南街，後因臺灣總督府於臺北進行市區改正，1910年搬遷至現址。1926年報紙記載，大稻埕慈聖宮在農曆10月將舉行「建醮祈安」儀式，該地紳民為辦理建醮事務，各人找尋巧匠設醮壇，並由各茶商、米商團體負擔共有14壇。參見〈慈聖宮建醮順序〉，《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10月26日，第4版。



有胡柳生與白成枝等人，但他們最後都無罪，只有父親被判傷害罪，須繳交罰金二十圓。父親不甘心，上訴到二審，法院卻還是維持原判決。

那時他和稻江義塾及背後的教會團體有往來，稻江義塾（今建昌街）是稻垣藤兵衛<sup>17</sup>在臺北設立的組織，曾經發起「廢娼活動」，有些三七仔（sam-tshit-á）<sup>18</sup>吃過他們很大的虧，父親參加過幾次他們辦的讀書會與講演會。當時大稻埕地方分為兩派勢力，其中一派是保正大頭貴。大頭貴很不滿父親，三番兩次說要殺害他，父親因此一度躲藏在稻江義塾，那時候他不過才十七、八歲；另一派以「粉鳥辜」為首的兄弟要為他出頭，事情鬧得有點大。後來有人知道父親被罰款，暗中幫忙他，就私下拿錢給稻垣藤兵衛，要他出面替父親繳交罰金。聽說那人私下給的金額超過二十圓，稻垣藤兵衛繳完罰款還有餘。稻垣藤兵衛和父親很好，但除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他都反對，常常去電通社找父親。一開始

17 稻垣藤兵衛(1892-1955)，日本京都人，1914年從同志社大學政治經濟部經濟科畢業，同年來到臺灣。1916年於大稻埕港町二丁目成立以平民與兒童為主之私塾「稻江義塾」，在臺灣展開社會事業。稻江義塾不以保護、救濟，而是以「自立支援」為目的，並企圖從男女平等觀點實踐基礎教育。他另外創設「セツルメント人類之家」，該組織起源於19世紀後英國發起的「睦鄰運動」(Settlement movement)，此活動主張志願服務者和窮人共同生活，並推動鄰里改革和提供教育與服務。「セツルメント人類之家」下有社會部、兒童部等組織，幫助其實踐社會事業。1925年參與反抗財團(三菱)的土地買收活動。1927年成立《非臺灣》雜誌，隔年義塾搬到大稻埕下奎府町三丁目。戰後1947年被遣送回到日本。參見宮本義信，〈“同志社人”稻垣藤兵衛の基督教社会事業をどうとらえるか—日本統治時期臺灣の稻江義塾を中心に〉，《総合文化研究所紀要》(京都：同志社女子大學)，第27卷(2010年)，頁101-124。

18 意指皮條客。

父親雖然和他們有所互動，但後來他認為基督教的排他性太強，慢慢就沒有往來了。

在電通社任職期間，父親在一次機緣下，由王萬得介紹認識了蔣渭水。王萬得相邀父親、胡柳生、白成枝等人一起去找蔣渭水談話。後來蔣渭水有一次跟父親聊天時提到，像臺灣這樣一個小島，四面都是海，要造反也逃不出去，欲和日本相對抗，「武裝革命」絕對沒前途，不僅不會成功，只是白白犧牲而已。若要進行反對運動，要「犧牲小、效果大」。所以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父親在和吳振武、<sup>19</sup> 黃華山<sup>20</sup> 討論武裝對抗的可能性時，就想起蔣渭水說過的這番話。他自己也覺得以臺灣一個小地方很難和

19 吳振武(1918-1999)，高雄旗山人，1940年臺南師範學校公學師範演習科畢業。師範學校畢業後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體育科就讀，畢業後原先預定分發教書，但因參加日本海軍兵科預備班考試並錄取，前往海南島服役。終戰前升為海軍大尉，為日本臺灣籍軍人官階最高者。戰後回臺，於臺中師範學校擔任體育教師。二二八事件期間，三月二日奉校長洪炎秋之命前往臺中戲院參與人民大會以了解情況，婉拒謝雪紅委任之處委會學生隊長，中師成立治安本部後出任指揮，但由洪炎秋向警總參謀長柯遠芬尋求諒解。四日任民主保衛隊總隊長。五日晚上自家中赴中師途中，行經南臺中馬小溝，因腿部受傷，放棄指揮權。事件後遭通緝，賴洪炎秋奔走，海軍總司令桂永清亦來電要他赴中國南京，以海軍少將軍階任職海軍總部參謀主任，始免於難。參見〈吳振武(南師)力闢圓盤投で一位 全國中等陸上競技〉，《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8月10日，第8版；《府報》，第3856號，1940年4月10日；轉引自許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四)》，頁66。

20 黃華山，1907年生，彰化大村人，臺中第一中學校畢業後，1929年進入府立臺南高等商業學校就讀。畢業後擔任加藤商會臺中出張所所長至1940年，並兼市川實雄商店臺中支店長。隔年兼任臺中州澱粉工業組合專務理事。參見興南新聞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頁150。

大國對抗。臺灣的歷史，譬如自鴨母王朱一貴開始或是林爽文事件時，反抗者取得短期的勝利是可能的，但要獲得最後結果是不可能的。在幾次往來後，我父親對蔣渭水的印象也不錯，開始追隨他進行社會運動。

### 三、從臺北青年會到黑色青年會

1922年，父親他們籌組「臺北青年會」，<sup>21</sup> 想要以此名義來活動，但沒有通過警察的審查。父親他們向警察申請時，警察提及當時臺灣人已經成立了一個「臺灣文化協會」，不適合設立另外一個組織。後來經過討論，他們決定以「臺北青年體育會」再次提出申請。該會以推廣「保健」為號召，以楊朝華<sup>22</sup> 為幹事，

---

21 依據《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記載，官方認為在島內出現「無產青年」團體，最早可追溯到1923年在臺北無產青年團體，他們以「臺北青年會」為名進行活動，在1923年7月30日太平公學校同窗會上由翁澤生以「臺灣語」演講，進行中引發衝突。此後翁澤生、洪朝宗、鄭石蛋等十餘人和蔣渭水、王敏川、許天送等一起商議討論，最後預定在8月12日舉行發會式。但最後在8月11日被警察機關以違反治安警察法予以解散。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882-883。

22 楊朝華，1899年生，宜蘭人，上海暨南大學商科專修科畢業。楊朝華為知名雕塑家楊英風父親。他本欲繼承父親糖廠，但糖廠遭併購，因此前往中國東北發展，最初以販售臺灣土產為主，後在滿洲國經營戲院。九一八事變後他移居北京，繼續經營戲院。根據資料顯示，他在1942年經營「新新戲院」，曾組織木偶戲劇團巡迴北京、天津一帶。另外他在天津還經營華道商行，戰後被任命東北挺進軍總司令部秘書，並在江南一帶經營米業。參見許雪姬，〈日治時期在北京的臺灣人〉，《長庚人文社會

會址在今日的延平南路上，會員有白成枝、洪朝宗、連震東<sup>23</sup>等人。父親他們籌組體育會是希望能在地方上設置一個運動場，同時也打算從事一些社會活動。但父親去警察局辦理登記時，一下子就被警察識破，警方認為運動是藉口。但日本人多少是有依法行事的觀念，先拒絕了他，但經過協調，最後還是完成了體育會的登記。後來楊朝華等人又組織了「臺北青年讀書會」，<sup>24</sup>同樣利用「臺北青年體育會」<sup>25</sup>的空間，讀書會和體育會的成員有很多重

---

學報》，第一卷第一期（2008年4月），頁77。

- 23 連震東（1904-1986），臺南人，1905年父親連橫舉家前往廈門，隔年返臺。1923年進入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經濟部預科就讀，參與該年八月成立的「臺北青年體育會」。畢業後回臺進入「昭和新報社」就職。1939年擔任國民政府陝西西京建設籌備委員會秘書，1942年擔任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政治教官，1944年赴重慶任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組長。戰後1946年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參事、臺灣省參議會秘書。1947年為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執委兼總務處處長、《台灣新生報》董事。1950年擔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1953年任中國國民黨第五組主任、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廳長，歷任民政廳廳長、秘書長。1959年曾因勾結商人違法開發淡水海埔新生地，遭到監察院彈劾。1960年至1966年為內政部長。1986年去世，由蔣經國總統發布褒揚令。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188；《監察院公報》，第274期，1959年9月17日；《總統府公報》，第4707號，1986年12月26日；鄭喜夫，《連故資政震東年譜初稿》（臺中：臺灣省文獻會，1989），頁1-499。
- 24 在青年會禁止設立後，翁澤生、楊朝華、鄭石蛋另外在1923年9月25日於淡水河上的船中舉行會議，但後因會員內訌而未能進行。翌年4月以蔣渭水、連溫卿、王敏川等為首，潘欽信、高兩貴、王萬得等人找了二十餘人參與每月舉行兩次的讀書研究會。故當時警察機關指出，參與活動者是在文協左派者的指導下進行。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883-884。
- 25 在臺北青年會設立遭到阻止後，同批人在蔣渭水、王敏川建議下，以謀求體育向上為宗旨而設立。當時警察機關認為，他們這些人表面上標榜

疊，父親也是讀書會成員之一，實際上負責體育會。兩會的會所都在一起，開始時是租現在永樂市場出來巷子的三樓房子，月租十五元；三個月後，搬到太平市場附近天主堂的房子，月租十元。

「臺北青年體育會」以普及衛生、鼓勵體育活動為宗旨。蔣渭水知道此事後，親自出來替他們向當時大稻埕的地主張家坤交涉，在太平市場旁邊得到面積一甲多的運動場。父親取得運動場後，就想辦法到基隆河運了好幾牛車的沙子過來，僱工做沙坑和跑道，經費主要是蔣渭水贊助的。之後他看人在練習「竹篙跳」，覺得很有趣，自己就在 1923 年左右開始練習撐竿跳，也同時練習「跳高」與「跳遠」項目。當時臺灣最好的紀錄是 2.9 公尺，他第一次參加比賽就跳出了 3.06 公尺，創臺灣紀錄，第二、三名都是日本人。1925 年他的紀錄是 3.18 公尺，<sup>26</sup> 1926 年則是 3.26 公尺（按：應該是 3.25 公尺）。<sup>27</sup> 父親的跳高記錄 1.7

---

以體育為主，借用了專賣局後方五百坪田地實施運動競技，但實際上並無實際運動者，反而實施公共演講或舉行研究會等等。1925 年 4 月他們找到一處獨立會館，每月定期召開一次例行會議，一時之間會員達到百餘人，另外每週六舉行「雄辯會」，討論有關勞動、政治、思想與社會問題。因 1925 年底開始整頓未繳納會費會員，人數逐漸減少，1926 年底關閉會館。參見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 883。

- 26 據 1925 年《臺灣日日新報》報導，該年 4 月 3 日於臺灣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預選會上，隸屬臺北體育青年會的高兩貴以 3.18 公尺的跳高成績打破了前一年 3.06 公尺記錄，成為新任紀錄保持者。〈棒高跳て前年の記録を破つた高兩貴君〉，《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4 月 4 日，第 3 版。
- 27 有關高兩貴撐竿跳（日文稱棒高跳）的成績，1924 年 5 月 11 日在臺北跳出 3.06 公尺，到 1925 年 4 月 3 日在臺北跳出 3.18 公尺，11 月 11 日同年第六次全島大會中跳出 3.25 公尺。參見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臺

公尺也是追平當時臺灣的記錄。父親破了三米二的撐竿跳紀錄後，在臺北很是風光，走到哪大家都認得他，有「體育明星」的味道。那時日本人比賽還輸他，自然而然比較讓人看得起。

高何謙先生補述：大伯高炎曾對我說過：「你阿公比較疼老三，老三要用錢的話都會幫忙。」

因此當時父親從事社會運動需要錢時都能得到祖父的資助。後來大概是當局指使的日本人爲了不要讓他再參加社會運動，建議由地方仕紳出資，送他到東京念書，接受參與奧運選手的訓練，但他都拒絕。



著 T 字樣運動服的體育會會員，右三爲高兩貴

父親在 1920 年代的立場比較靠近社會主義或無政府主義，應是受到蔡孝乾、王萬得、洪朝宗、翁澤生等人左派思想的影響，青年會上讀的書如馬克思的「資本論」、「剩餘價值論」，克魯泡特金 (Peter Kropotkin)、<sup>28</sup> 巴枯寧 (Mikhail Bakunin)<sup>29</sup> 的無政府主義、蘇聯共產黨布哈林 (Nikolai Ivanovich Bukharin)<sup>30</sup> 等的

- 
- 28 克魯泡特金 (1842-1921)，俄國人。8 歲時得到沙皇尼古拉一世提名，取得聖彼得堡侍從軍官學校候補生資格，15 歲正式進入該校就讀。20 歲畢業時於西伯利亞黑龍江地區服役，之後在該地進行地理考察，1867 年入聖彼得堡大學就讀數學系，兩年後成為俄國地理學會理事。30 歲時參加革命民粹派的秘密組織柴可夫斯基，1874 年曾因此入獄。兩年後他逃獄成功，潛抵英國，並持續參與蘇維埃的各項運動。此後數年間，因參與活動陸續遭到瑞士、法國政府驅逐。1883 年於法國被判處五年監禁，但隔年獲釋，遭到驅逐。1917 年，歷經 41 年流亡後回到俄國。1921 年去世。參見陳之驊，《克魯泡特金傳》(北京：社會科學院，1986)，頁 276-282。
- 29 巴枯寧 (1814-1876)，出身俄國特維爾省農奴之家。1828 年入聖彼得堡砲兵學校就讀，畢業後投身軍旅，在 1833 年申請退役獲准，並前往德國學習。1841 年前往柏林學習邏輯、美術、哲學與物理學。隔年以筆名在雜誌上發表〈德國的反動〉，因此受到普魯士警方監視。1844 年因不聽俄國沙皇返國命令，開始流亡。1848 年參與在布拉格的斯拉夫人代表大會，以自由、民主、平等與博愛口號進行各斯拉夫民族解放與聯合。1849 年一度遭到逮捕，並引渡回俄國。釋放後仍持續原來運動。1862 年要求沙皇召開國民會議，主張建立俄羅斯與斯拉夫聯邦。1866 年起草〈國際革命協會原則與組織〉，以無政府主義為號召。巴枯寧雖和馬克思有所互動，但雙方無法取得共識，1869 年馬克思的第一國際上並不接受他，以他為首同盟因而解散。他在法國、西班牙與義大利都努力推動無政府主義，但最終都遭遇失敗。參見彭樹智，《無政府主義之父巴枯寧》(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頁 489-496。
- 30 布哈林 (1888-1938)，俄國莫斯科出身，中學時期開始參加社會主義相關組織。1906 年正式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隸屬布爾什維克。1907 年進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隔年進入該黨莫斯科委員會擔任委員。1909 年遭

理論，以及大杉榮、<sup>31</sup>河上肇、福本泉等日本左派的書，因此思想上比較左傾。我後來到臺大圖書館，查到鄭學稼<sup>32</sup>的書《蘇維

---

到逮捕。1915年至1916年間完成了《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一書，討論當時的各種國際問題。第一次大戰期間，布哈林與列寧在路線產生矛盾，他認為無產階級革命才是當前俄國面臨的問題，列寧則堅持民族自決之路。列寧去世後一度成為黨的主流，但後遭史達林等人清算，1929年遭解除一切黨職。在1938年一場對右派與反托洛斯基的審判中被判有罪，於同年3月15日被處決。參見鄭異凡，《布哈林論稿》（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頁7-16。

- 31 大杉榮(1885-1923)，為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1899年由新發田中學校轉往名古屋陸軍幼年學校就讀，但隔年因鬥毆而退學。1902年前往東京就讀順天中學校，畢業後就讀外國語學校(今東京外國語大學)法文科，1906年畢業。該年他因參與反對電車車資上漲的活動，被日本政府以「兇徒聚眾罪」起訴，後又因「赤旗事件」被判六個月徒刑。出獄後於1912年和荒村寒煙等創刊《近代思想》，後遭到廢刊，另外創立《平民新聞》。1920年他與友人一同創立「日本社會主義同盟」，同年到上海與共產國際接觸，創辦《勞動運動》雜誌。他在1922年秘密前往法國，但不幸在1923年遭到逮捕送回日本。同年9月16日發生關東大地震，他與妻子、外甥遭到憲兵隊逮捕、殺害，死時還不到四十歲。參見白井勝美等編，《日本近現代人名辭典》（東京都：吉川弘文館，2001），頁188-189。
- 32 鄭學稼(1906-1987)，福建長樂人，1929年江蘇省東南大學農學院畢業。1933年赴日研究日本史，回中國後擔任上海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1944年任國防部外事局上校專員，1945年任暨南國際大學教授。來臺後先後在臺灣大學、政治作戰學校與政治大學東亞所任教。鄭早年曾參加共產黨，脫黨後以研究蘇聯史、日本史與共產黨史為主要研究領域。在復旦大學期間因為所著之書《魯迅正傳》對魯迅有所批判，遭到其他學者批判而去職。來到臺灣後，他於臺大任教期間也因故在1953年8月新學期不續聘他。一種說法是他揭發了某個舞弊案得罪黨國要人，但依據臺大校方回覆監察院糾正案時的說法，校方認為鄭在講授經濟相關課程時對政府時局批判過度，「思想有問題」，故給予停聘處分。他一生著書甚多，被人稱為「書寫機器」，但所著書多為學術專門書，無法普及



埃俄羅斯史》、《第三國際史》、《列寧評傳》等，借來看，才知道史達林、列寧、布哈林、托洛斯基、普列漢諾夫、季諾維也夫等是怎樣的人，以及這些左派主張是什麼，當時父親讀他們的書籍都是閱讀日文版的。我想這些書籍，多少也顯示了父親那時代的時代精神（zeitgeist）吧！在此之前，父親不會主動跟我們講那些有關共產的思想。晚年他曾說他受到日本共產黨大杉榮等人很大的影響，也曾說臺灣共產黨受到日共與中共間的拉鋸。

他和洪朝宗等人在 1925 年創立了「無產青年會」。另外他們還計畫要在 1926 年 6 月 17 日「始政記念日」進行群眾演講，並選擇在建昌街、運動場與體育會太平市場做為演講的地點。當時核心成員除父親外還有洪朝宗、潘欽信、王萬得、鄭明祿、<sup>33</sup>連溫卿與白成枝。當天活動預定於晚間七、八點開始，但他們上午分發傳單時，當局就知道了。到了傍晚五點鐘警察就找上父親，說行政主任要找他講話，要他到北署。那時候父親很注意

---

到一般大眾。1987 年病逝於臺灣。參見〈臺灣大學兩事處置失當 停聘教授跡近報復 錄取新生名額不均 致失國家普育人才旨意 監察院教委會提案糾正〉，《聯合報》，1953 年 12 月 12 日，第 3 版；古遠清，《幾度飄零：大陸赴臺文人沉浮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 97-104。

- 33 鄭明祿，1902 年生，苗栗苑裡人，1921 年畢業於臺灣商工學校商科第二屆，1928 年 6 月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文協左傾後的要角。1921 年 11 月發生新竹事件，因而被檢舉扣押十個月。1929 年 11 月第三次新文化協會在彰化開會，鄭明祿告發連溫卿的罪狀，連溫卿遂被開除。日治末期，曾參加臺灣放送局北京語放送工作，戰後曾任桃園縣教育科長、省立基隆中學校長、省立豐原商業職業學校校長、中國國民黨臺中縣黨部副主任委員。參見王詩琅譯，《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頁 364；葉榮鐘、蔡培火等著，《臺灣民族運動史》（臺北：自立晚報，1987），頁 351-352。

這類事情，擔心又被警察「檢束」，連忙把相關文件交給別人保管，並且一直問那位警察究竟爲了何事？那個人一直要父親不要緊張，跟他走就對了。父親無奈之下只好跟他走，後來他們到某處去找行政主任，也看到現場有近百位警察在待命。行政主任看到父親，就說要「檢束」他，直接拘留，並命令他們不可以舉行演講。<sup>34</sup> 拘留了兩、三個小時後將他釋放。當天活動也因警察「臨監」而中止，發起人除連溫卿以外，大家都遭到檢束，起訴的檢察官就是三好一八，<sup>35</sup> 以違警令起訴他們。三好一八跟父親說，所有人之中最可惡的人就是他，鑰匙是他保管的，而他竟然讓大家開抗議會，最後判他拘留十天，洪朝宗、王萬得在法庭上出言不遜，則是二十天。聽說當時被抓的原因是父親和蔣渭水他們用體育會的名義來宣傳，實際目的和組織宗旨不符合，因此遭到取締。<sup>36</sup>

34 依據報紙報導，1926年始政記念日當天，文協份子在臺北市湊町舉行政談演說會，但遭到警方臨監中止，由於警方知道他們可能在活動被中止後會另闢戰場，預計在日新町的「臺北青年體育會事務所」舉辦第二場演講，因而在第一場活動中止後隨即將高兩貴、鄭明祿、連雲[溫]卿、王萬得與潘欽信與洪朝宗等自稱無產青年者加以檢束。其中王萬得在留置場內唱歌而受到嚴重處分，其他被檢束者也跟隨王萬得一同唱和，被報紙形容爲狂妄。參見〈始政記念日に 騷擾を目論んだ 文化協會の一味 近く嚴重處分されん〉，《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6月19日，第5版。

35 三好一八(1872-?)，日本佐賀縣人。1899年帝國大學法科大學畢業，同年擔任司法官見習，爾後先後歷任長崎法院判事、佐賀法院判事、臺灣法院檢察官、關東都督府法院判官、大連都督府法院判官、高等官五等、從六位、臺中地方法院檢察官。參見〈臺灣法曹略傳〉，《臺法月報》，第5卷第3期(1911年3月23日)，頁4。

36 警方最後起訴了五位文協會員，分別是潘欽信(臺灣民報事務員)、洪朝

因為參與了政治活動，父親也錯失了一些榮譽。例如那時候每年的明治神宮運動會（相當於日本全國的運動會），會邀請臺灣體育團體組隊參加，父親本來有機會參加，但當時警務局保安課長說這個青年思想有問題，因此未能放行。有一年是由鐵道部的川橋氏帶隊，到日本時接受《讀賣新聞》記者訪問時就說，本來有一位高君撐竿跳實力強，有希望奪牌，但因思想問題，警務局保安課反對他參加，這是一位當時在場參加田徑 200 米、400 米跑的選手林信願回臺告訴父親的。<sup>37</sup>

父親在日本時代參加社會運動的巔峰就是參與了「臺灣文化協會」。當時文協有路線的問題。蔡孝乾、洪朝宗一派人想要擴大組織，在臺北、彰化、新竹都成立了「無產青年會」。父親他們也參加了蔡孝乾等人的活動，除他以外參加者有洪朝宗與其妻洪細娥、王萬得、白成枝與楊榮華。楊榮華是父親太平公學校同學，曾經到漳州去參加中國軍隊，回來後被關，得了精神病。大家在 1926 年 12 月 31 日到彰化去，要參加臺灣文化協會的大

---

宗（上海大學學生）、胡柳生（廈門中華中學校學生）、王萬得（臺灣民報事務員）與高兩貴（電通社社員），其中潘欽信與洪朝宗以違反治安警察法起訴，其他人則是違反違警例起訴。最後潘欽信被罰款十円，胡柳生、王萬得被拘役 15 日，高兩貴則被判拘役 10 日。後又據報紙說潘欽信因遭到文協辭退職，無法繳納罰金，因而傳出他還是在監獄受了十日的刑。參見〈文協會員 嚴重處罰 される模様〉，《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7 月 3 日，2 版。〈文化協會の 不穩分子 處罰さる〉，《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8 月 3 日，2 版。〈不貞腐れの文協一味〉，《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8 月 6 日，5 版。

- 37 1930 年高兩貴原能參加一年一次的東京明治神宮田徑大會，但因他參與社會運動而遭禁止。參見雷寅雄訪問、紀錄，參見〈臺灣田徑之神—高何土〉，頁 24。

會，巫永昌的妻兄吳榮州請他們住在磺溪醫院附近他的住宅，很熱切招待他們。當時文協對改組提案分為三派，有蔡培火案、連溫卿案與蔣渭水的折衷案。當時連溫卿和蔡孝乾已經合作，連溫卿和山川均等社會主義者有來往，也和王萬得、蔡孝乾等從中國回來的共產黨人士有密切互動。父親認為蔣渭水思想較接近左派，但是社會運動需要經費，因此蔣渭水常說不能得罪霧峰林家的人，才會提出折衷案。蔣渭水雖對霧峰派的非常敬重，但他和蔡培火等人並不和睦，處於對立的情況。大家都知道蔡培火是耶穌教徒，又在宣傳臺灣羅馬字運動，父親他們並不喜歡他，都稱呼蔡培火是「臭屁火」。後來父親問連溫卿才知道他已經與張信義、<sup>38</sup> 林碧梧<sup>39</sup> 商量好，由他們負責活動需要的經費，但是蔣渭水

38 張信義(1906-1972)，臺中后里人。就讀臺中中學校時因故退學，轉往日本就讀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商科，但並未畢業。由於家中經營實地業，是文協左傾後重要的經濟支持者之一，被選為中央常務委員。1927年5月曾聲援臺中第一中學學生與11月抗議新竹警方對文協活動的取締，被拘留數月，後以不起訴出獄。文協第三次會議時，張信義等人的提案因臺共杯葛未能通過，乃萌生退意，但被慰留，此後即不再出席文協的相關會議，後仍歸於和好。戰後1945年9月15日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臺灣區團臺中分團籌備處成立，擔任主任兼臺灣區團幹事，以及中國國民黨臺中市黨部執行委員，1946年3月被選為臺中縣參議員，1947年二二八事件期間參與臺中縣市、彰化市的聯席會議，被名列重要人犯名單中。1951年7月擔任臺中縣首任后里鄉民選鄉長，但因政治案件被捕，以「包庇或藏匿叛徒」，遭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出獄後不久因心臟病過世。參見《續修臺中縣志》，頁41-42；日治法院檔案，臺北地院，刑事判決原本，昭和3年第12冊12月，第578頁，昭和3年第1168號；轉引自許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三)》，頁494-498。

39 林碧梧(1895-1949)，臺中神岡人。神岡公學校畢業後就讀於公學校補習科，並研修漢學。之後投身社會運動，擔任過文協中央常務委員。另曾

並不知道這件事，折衷案沒有過的事讓蔣渭水很難受，但他沒說什麼，只怪連溫卿有點陰沉，無產青年太急進。

蔣渭水後來退出文協，另外籌組臺灣民衆黨，但不久也遭到解散。不過這件事倒是沒有影響蔣渭水和父親的關係，他和阿甜（陳精文女士）以後到臺中也都是住我們家。他過世後，陳女士到慈雲寺去住，不與外界接觸，父親是極少數去看她，她會出來見面的人。我記得父親最後一次去看她是我大學四年級時，大概在1974年，說她過得很平靜。父親與蔣松輝一直到晚年都有聯絡，曾和他談起文協改組鬥爭的情形。蔣松輝也同意父親的看法，如果激進派事先有與蔣渭水溝通的話，蔣也可以接受。在1978年，父親見到剛開始做臺灣史研究的黃煌雄，也向他表達這個觀點，畢竟蔣先生退出文協是一件很大的事。



蔣渭水、陳精文贈送  
簽名合照給高兩貴

擔任「大眾時報社」社長。1928年時曾和張信義一同因抗議新竹警方對文協活動的取締一事被起訴，但獲判無罪。參見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頁466；日治法院檔案，臺北地院，刑事判決原本，昭和3年第12冊12月，第578頁，昭和3年第1168號。

事實上，蔡孝乾在 1926 年的 12 月 23、24 日前後即準備成立「臺灣無產青年會」，因要以「普及衛生思想，鼓勵體育運動」作為宗旨，警察較不會注意，去登記較容易成功，所以要以身為運動家的父親撰寫會章、綱領並去登記。父親一開始不同意，認為這太天真，日本警察怎可能輕易上當。但因蔡等人開會時提出表決，決議以多數決通過，要求父親照辦。無可奈何之下，父親只好在 1926 年 12 月 25 日，到總督府保安課登記。那天也剛好是大正天皇去世之日。父親說他要成立全島性組織「臺灣無產青年會」，當時小林光政<sup>40</sup>課長大吃一驚，說何以臺北州沒來通知這件事情。在場還有新高新聞社長唐澤信夫，<sup>41</sup>保安課長就跟社

40 小林光政，1892 年生，日本栃木縣人。1913 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法律學科就讀，尚未畢業時已取得文官高等考試合格。1917 年畢業後於警視廳擔任警部，1919 年赴朝鮮擔任朝鮮總督府事務官，敘高等官七等。1920 年擔任朝鮮總督府警察官講習所教授。之後回到日本本土擔任臨時震災救護事務局事務官。1925 年擔任臺灣總督府事務官。此後陸續擔任警部、警部補任用考試委員、國勢調查部主事、代理總督府警務局保安課長後真除保安課長。1928 年 8 月後陸續擔任沖繩縣警務部長和福岡縣內務部長。一度參選國會議員但未能勝選。此外他還曾擔任過青森縣知事。參見〈小林光政陞等、俸給、勤務〉，《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 4001，文號 47（1925 年 4 月 1 日）；〈督府保安課長更迭 山内氏轉任岡山縣事務官 後任小林沖繩縣警察部長〉，《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8 月 8 日，夕刊 4 版；〈福岡縣內務部長に小林光政氏内定〉，《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5 月 8 日，2 版；〈原、中村の 兩巨頭落選 臺灣關係者の當選〉，《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 2 月 23 日，第 7 版。

41 唐澤信夫，1905 年生，日本長野縣人。1923 年早稻田大學法學部畢業，同年四月進入東京朝日新聞工作。隔年退社，轉往新愛知新聞社工作。1925 年退社，赴臺任職於臺灣日日新報社。之後自行創立新高新報。他被形容為「能說善道」者。1935 年參加臺北市會議員選舉，當選民選議員。1939 年前往中國廣東擔任《廣東迅報》社長。參見臺灣新民報社

長介紹父親是臺北青年的領導。但因天皇駕崩，警察業務繁忙，父親他們的登記在形式上又合法，小林遂無心再爭論，讓他辦理登記。

1927年1月，文協召開大會，會議當天八點半開始，因為父親支持的連溫卿一派人數較少，僅有當時臺北、彰化參加無產青年會，後來轉入文協的四、五十人，人數較少數。父親問蔡孝乾等等開會要用什麼方法進行鬥爭會比較有效？他認為蔡孝乾既然在上海大學唸書，應該學習到不少「鬥爭」方法，要求他指導。蔡孝乾第一時間沒有提出很好的方式，要大家讓他想十分鐘。十分鐘結束後，父親他們催促他說：「孝乾君，時間到了喔！」但蔡還是無計可施，只好說：「若王敏川舉手時大家就一起跟著舉手。他說什麼，你們就跟著說，並且要在後面舉手支持！」父親聽了以後，很生氣地罵蔡孝乾：「你們這些人去上海唸書，竟然只學了這樣的鬥爭方式回來，怎麼有資格來領導臺灣的社會運動？」無可奈何之下，父親等人回到會場，採取隨機應變方式。在討論過程中有人反對王敏川的發言，他們就想辦法作亂、擾亂會場秩序，或是有人提出反對言論，他們就對那個人吼，要把不同的聲音壓下去。父親認為因為他們這派人數太少，顧不得風度，不得已只好採取這樣的方式來鬥爭。彰化吳清波是他的好友，吳發言，父親也只得用這樣子的態度對付他，這違反他的本性，所以事隔五十多年，父親還是耿耿於懷。最後文協大會通過連溫卿的提案，這也意味著蔣渭水的折衷案失敗了，

---

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7），頁95；〈唐澤信夫氏（廣東迅報社長）〉，《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12月5日，第1版。

即便父親和蔣渭水的關係還是維持，但因為父親當時支持連溫卿這派，對蔣渭水有點不好意思。最後中央委員選舉時，青年中只有父親與洪朝宗他太太洪細娥當選中央委員，洪細娥當婦女部長。<sup>42</sup>

1927年2月，「臺灣黑色青年聯盟」遭到檢舉，父親認為這是文協中央委員選舉之後的效應。蔡培火在文協的提案失敗後跑去警務局，跟警察說：「他自己這一派是老派、比較溫和的，但是現在這些年輕人很激烈喔！」要警察方面注意，導致後來總督府大規模的逮捕行動。父親他們都遭到當局逮捕，罪名是和組織黑色青年會有關，但是到底是誰組織黑色青年有不同的說法，父親知道的是當時無政府主義者大杉榮的一位學生，是當上軍官的近藤，<sup>43</sup>有去蘇聯的經驗，他有一個部下叫小澤。<sup>44</sup>某次小澤到臺

42 1927年1月3日午後，於臺中公會堂舉行的臺灣文化協會臨時總會，出席代表共有133名，蔡培火派出席者較少，而連溫卿派因為有來自大甲、彰化青年會員與臺北無產青年參與，在會中取得壓倒性的多數。陳逢源等人來到會場後，發現大勢已去，隨即離開。連派最後獲得了勝利。在2月舉行的第一次全島代表大會臨時中央委員會上，高兩貴擔任了宣傳部部員。但在後來的正式大會中則退出宣傳部部員的職務。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192-193、206-208。

43 推測為近藤榮藏。近藤榮藏：（1882-1965），東京小石川人。東京高等小學校畢業後，於1902年起兩度前往美國，在美國時認識了片山潛，開始信仰社會主義。1922年加入日本共產黨，擔任中央委員。後因日本政府取締共產黨而前往蘇聯，出席共產國際第五次大會，返國後脫離共產黨。之後他加入日本勞動黨，採取中間路線，在1930年代到1940年代間，他的立場則由「國家社會主義」慢慢轉向到「日本主義」。戰後從事社會福利工作，1965年去世。白井勝美等編，《日本近現代人名辭典》，頁439。

44 推測為小澤一，1905年生，父親曾任彰化巡查，精於劍道。15歲就讀臺北第一中學時母親病逝，父親調職基隆，將他寄養在一位獸醫友人家。



灣找他擔任中學校教師的姊姊，也利用機會去找蔣渭水。蔣渭水與他交談過程中又安排他和無政府主義者周和成見面，後來他也和艋舺王詩琅、彰化吳滄洲<sup>45</sup>見面，他們當時參加周天啓、陳崧的「新劇社」，在臺中「樂舞臺」<sup>46</sup>排演。小澤得知他們預備在今日大聖街公園的一個地方組織「臺灣黑色青年聯盟」，後來他返回日本後寫信向軍人長官近藤報告他在臺灣活動的事情，沒想到信件被日本警視廳攔截。日本警視廳後來轉給總督府警務局，因此才在1926年農曆過年（西曆1927年2月）時進行全島總檢舉。父親當時被抓去北署，不僅是他，洪朝宗、楊榮華、白成枝等人也都被抓，兩天後蔡孝乾也被抓。蔡孝乾要人帶話偷偷跟父親說：「臺灣無產青年會要說你是組織的，不要說是我組織的。」

---

後由獸醫的經濟援助繼續就學，雖考上東京的獸醫學校卻因關東大地震而輟學。後以思想家、青年無政府主義者、斷頭臺社、黑旗社、全國黑色聯盟緣等身份活躍各界。1928年因違反治安警察法遭判刑時居住於苗栗郡苗栗街鐵道部僱員大畑喜八郎處。在隸屬臺灣文化協會的四十四名無政府主義青年所組成的秘密結社，他是中心人物，但他在軍中服役時因為同志寄來的信而讓組織曝光。公開審判時古屋貞雄律師、安保忠毅律師、臺中的蔡伯汾律師等，為小澤一、吳滄洲、王詩琅、吳松谷等人辯護。小澤服完刑期後，被流放到內地，在1929年12月身體漸衰，船隻抵達門司港時便已死亡，據說是上吊死亡。參見竹中法子著、熊凱弟譯，《日治臺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臺灣（昭和篇1926-1945）上》（臺北：時報文化，2009），頁23-25；日治法院檔案，臺北地院，刑事判決原本，昭和3年，第12冊12月，頁501。

45 吳滄洲，1905年生，彰化人，從事土地租賃業。其因參加籌組「臺灣黑色青年聯盟」，和王詩琅、吳松谷與小澤一等人遭到官方以違法治安警察法起訴。在判決中小澤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王詩琅和吳滄洲則是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吳松谷有期徒刑一年。參見日治法院檔案，臺北地院，刑事判決原本，昭和3年第12冊12月，頁501。

46 臺中的戲院，位於柳川東路。

希望有參與撐竿跳比賽等體育活動的父親，當最初以推廣體育建立的青年體育會的組織負責人，父親就一肩扛起。但在警視廳馬上被警察駁斥，說父親表面上組織青年會，實際上就是要組織黑色青年會，當北部無產青年負責人。後來被送去法院，那時候法官叫做犬飼。<sup>47</sup> 父親記得他一度在臺中擔任法院院長。後來父親曾去找他問說，你還記不記得就是你審判我的。這次檢舉父親被關了八個月，一次兩個月，延期四次共八個月，加上在北署拘留半個月，並沒有被判什麼樣的罪名，給他「豫審免訴」的處分。父親雖然身體還算強壯，但是因為被關超過半年以上，監獄裡營養很差，飯裡常摻有石頭或沙，出獄後身體變得不好，幾乎無法再做田徑運動。我曾聽他說，他的好朋友洪朝宗因其他案件入獄，最後死在獄中。還有他最好的朋友翁澤生，後來被捕，奄奄一息時才被放出來，不久就死了。他死了許久，父親都不知道。王敏川在彰化時，父親曾經寫信去問他要不要幫忙，他有回了一張明信片來說：「大丈夫！（日語）」，後來才聽說其實他過得很貧窮，身體不好，也早逝。

---

47 推測為犬飼吉備雄，1893年生，日本岡山人，1917年京都帝國大學英法科畢業，同年擔任法官。1925年6月從舞鶴區裁判所兼京都地方裁判所舞鶴支部刑事轉任臺灣總督府法院法官。1935年轉任高等法院覆審部部長，1940年3月任臺中地方法院院長。有養子一人。參見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頁31。



「六一七事件」出獄後的獨照



六一七事件潘、高二君出獄紀念合照（前排左一為高兩貴、左二為潘欽信，高兩貴後站立者為胡柳生，其右為王敏川，後左站立、著西裝打領帶者為王萬得）

## 四、遷居臺中當記者

在黑色青年會事件後，無產青年組織就解散了，但文協還在，張道福<sup>48</sup>在臺北支部，還有林清海與薛玉龍、<sup>49</sup>薛玉虎<sup>50</sup>兄弟，薛玉龍聽說是漢學家，但得了癡瘋病（那時稱「thái-ko」）。後來父親很不喜歡左、右派互相鬥來鬥去的情況，就漸漸沒有像以往那麼熱衷，但也曾到新竹、大湖等地演講。<sup>51</sup>

1929年電通社臺北支局長官佐籐謙吾跟他說，臺中缺一個去報導米穀期貨買賣消息的人，建議他不如到臺中去，在臺北原本的職務讓其弟高何土來接任。父親原以為支局長對他非常好，

48 張道福，1907年生，臺北蘆洲人。曾在1941年因違反國家總動員法被判處罰金150円。參見日治法院檔案，臺北地院，刑事判決原本，昭和16年第8冊A8月，第354頁，昭和16年，第5663號。

49 薛玉龍，1902年生，臺北市永樂町出身，以油漆批發為業。1928年和其弟因違反「暴力行為處罰法」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但法官判薛玉龍緩刑四年。參見日治法院檔案，臺北地院，刑事判決原本，昭和3年第12冊12月，第538頁，昭和2年，第2742號。

50 薛玉虎，1906年生，臺北市永樂町出身，除油漆批發商外亦製造油漆。1928年與其兄薛玉龍因違反「暴力行為處罰法」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參見日治法院檔案，臺北地院，刑事判決原本，昭和3年第12冊12月，第538頁，昭和2年第2742號。

51 據報紙記載，高兩貴仍有參與文協活動，他在1927年12月20日受文協彰化特別支部安排，於彰化天公廟與賴和、陳金懋、郭炳榮等一同進行演講，高兩貴的講題為「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但此次演講依舊被中止。另外在1934年底蔡敦輝、李友三、劉天祿、陳總、黃白成枝、王詩琅等人籌組亞洲黎明協會，並發行機關誌「大亞洲公論」，而高兩貴也參與其中。參見〈彰化定期講座 開左派講演會被中止〉，《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12月24日，第4版；〈彰大亞洲公論 議依新聞紙令〉，《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1月16日，第4版。

接受長官的建議到臺中去開拓電通社業務，後來才知道是北署要求電通社長官不要讓他待在臺北，所以他的長官才會如此建議他父親到臺中時，最初住在文化協會臺中分部，林朝權大哥林朝杰<sup>52</sup>本來要成立一個體育相關組織（中央運動器材賣店），但後來沒開業，父親就借他的電話作通訊。



與電通社台中支店職員的團體照（後排左五為高兩貴）

52 依據林恩朋編，《林朝榮（戟門）先生紀念文輯》，林朝杰為林慈（林茂慈）之長男，有一子林恩威。參見「賴永祥長老史料庫」，網址：<http://www.laijohn.com/archives/pc/Lim/Lim,Chu/family-tree.htm>（2018年4月20日查檢）。

父親出獄後，和蔣渭水等人都還有保持聯絡，也常回去找他們。蔣渭水一直希望父親回去主持文協，文協那裡的人也很希望父親能回去。那時候父親他的看法比較中立，左右派立場他都聽，因為他認為那時候根本不用分裂。當時日本的勞動、社會黨勢力正強，結果臺灣就是分裂，甚至互相檢舉，如黑色青年會造成很多人入獄，左派勢力幾無殘存，日後父親等人在白成枝家中開會，爲了蔡孝乾和連溫卿一起在文協「奪權」的事情批判蔡孝乾，最後蔡孝乾有向他們謝罪。

父親還和農民組合的人有所接觸，簡吉、趙港等等左派農組的人有時沒有米可吃，他都會叫米店送米給他們，因為父親在臺中經營的生意不錯，能夠支援從事運動的朋友。因此農組的人也和他很好，他也和楊達交好，戰後楊達在臺中東海花園務農，兩人還常往來。1981年父親的告別式，楊達也下山來參加。可惜的是「滿洲事變」（指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對臺灣社會運動取締越來越嚴格，官方下令解散農組與文協等等組織，要求國民團結。

1929年父親來到臺中後，除了當記者，也開始發展商業，在現在臺中市綠川西街與臺灣大道的交叉口開設「新高會館」，一樓是食堂，二樓則是有女給侍應的餐廳，戰後改稱爲「開羅餐廳」，<sup>53</sup> 這個名字是因為開羅宣言而來的。當時謝雪紅也在臺中經

---

53 據《臺灣民聲日報》1948年5月1日第2版刊載開羅茶館，亦稱開羅酒家，由日治時期文化協會積極分子高兩貴所經營，是地方名人經常聚會宴客的場所。1948年賣給鐵路飯店，改爲臺灣旅行社臺中分社，經整修裝潢後，該年5月1日重新開張，成爲知名的旅社飯店。轉引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日記知識庫網站」，《灌園先生日記》，1947年2月

營「大華酒家」，她和父親相信的無政府主義有所契合，因此關係甚好。有人認為父親偏向謝雪紅的立場，其實並沒有這樣的事情。

父親在社會上也得到一定的聲望，<sup>54</sup> 當時臺中市最熱鬧的地方就是火車站前的第一市場。戰爭的時候總督府徵調部分男性擔任軍伕，引起當地民衆不安，父親便和官方交涉，約定只要有加入「一心挺身隊」的人（都是男性）就不用徵調前往南洋，但同時官方也要求若需要後勤或民防任務，一心隊要派人供官方差遣，父親擔任隊長，日本軍部情報課也請父親擔任「囑託」，據他所知，臺北陳逸松、辜振甫也被請擔任這個職務，（日文話稱「囑託」，臺語是「chiok-thok」），軍方在想些什麼呢？根據監視他的特高透露，日本人準備美軍如果登陸臺灣時，想要利用民間一齊抵抗美軍，至少不希望臺灣人去支持美軍，因此從民間的頭人要先掌握。一心隊最多曾有五百多人。另外終戰前物資缺乏，經濟不振，黑道及好事者蠢蠢欲動，日本人亦要求一心隊協助維持社會秩序。父親也將綽號叫「加納（がら）」<sup>55</sup> 的何鑾旗<sup>56</sup> 納入隊裡，

3 日。

54 1941 年 6 月 30 日在臺中座舉辦的「志願兵感謝演講會」中，高兩貴與其他六人曾以青年代表的身分，和學生代表一同與會。〈志願兵感謝講演會 きのふ臺中座で開かる〉，《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7 月 1 日，第 4 版。

55 がら即指焦炭。

56 何鑾旗（1915-1949），臺中市人。就學臺中一中遭退學。平日好練拳擊，1938 年間，曾在臺中樂舞臺前、柳川東街一咖啡廳與當地流氓獨鬥而漸露頭角。1941 年被徵召至海南島，擔任軍伕隊隊長。兩年後，被「臺灣軍」情報單位吸收，任「一心挺身隊」隊附。戰後隱姓埋名蟄居一時，旋被國府當局吸收任義勇警察隊中隊長。曾任《大明報》記者。二二八事

讓他出任隊附，雖然何鑾旗在地方上常逞匹夫之勇，但讓他有任務在身才不會作怪。那時之「兄弟」都是個人張狂而已，而非今日黑道從事組織型態的犯罪行爲。所以臺中地方一位耆老游禮懺先生曾經在受訪時提到父親，他說：「當時臺中下階層的人大概都由他在管」。<sup>57</sup> 一心挺身隊那個時候從事的活動本來就有維護地方秩序的任務。從外人角度看有這樣的印象也是合理。

## 五、戰後初期參與二二八事件

1980年時，我們見父親身體不太好，想開始替他錄音，那時我們想說細節留在以後再談，先大略講過一遍，結果後來就因身體不適，沒有機會再補充了。最精彩的部分是談二二八的部分，卻沒有錄音，現在是靠我們的記憶來講。我是民國41年次（1952）出生，從幼稚園一直到小學，常聽到父親與朋友講二二八的事情，我想一部分是他講話比較不會有什麼顧忌，還有過去的人彼此間比較沒有互相防備的心，所以朋友來訪，尤其政治上的朋友相聚，都說起二二八的事情，什麼話都講，那時跟他

---

件期間出面擔任「警察局長處委會調員兼專賣局長及治安部參謀」，成立「特別警察隊」掌控警局，迫使臺中市警察局長洪字民出走。後來受何偉光少將之指揮，銜命緝捕謝雪紅未果。同年5月被捕至臺中憲兵隊，又移送整編第二十一師，後送臺北看守所，前後被關了一年兩個月。1948年6月，臺北高等法院以其罪證不足釋放。轉引自許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四）》，頁246-247。

57 參見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游禮懺先生訪問紀錄〉，《中縣口述歷史第五輯：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紀錄》，頁166。



聊天的朋友很多，像詹德志、李振芳、李曉芳<sup>58</sup>那些人，在臺北的時候還常常往來，他們在講二二八的事情，我大概都有聽到，還記得。

二二八那時大家都情緒沸騰，父親在戰前是一心挺身隊總隊長。小時候我還住在臺北時，父親曾經帶我去臺中玩，走到臺中第一市場那一帶時，很多店家、攤販，男男女女都會喊我父親「長仔 (tiúⁿ- ê)、長仔」，父親可說是很得人緣。雖然一心隊在戰後就撤銷了，但是臺中最熱鬧、人最多的臺中第一市場、臺中旅社一帶，那時候在綠川兩邊都是賣東西的、做生意的攤販，他們認我父親為頭人。所以有什麼大事，如二二八那種事件發生時，他們一定會來找頭人出面作主張，這是那時的民情；我父親他們身為地方頭人，也有同儕與公眾壓力，不能躲起來，像吳振武一開始，就看清局勢，不想出頭，但最後也在壓力下參與了部分的活動。

二二八事件蔓延到臺中後，3月2日在「市民館」開會，市民館是在第一市場隔壁，後來的戲院臺中座。那時左派、右派都來找我父親，仕紳一派的人就來找父親說：「mài- lah, mài-

---

58 李曉芳(1903-1996)，嘉義人。臺南師範學校畢業後赴廈門就讀集美中學、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在中國期間加入國民黨，但後因理念不合於1929年返臺經商，加入臺灣文化協會，被日本警察機關歸為「上大派」。戰後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嘉義分團幹部，協處理日產接收及日人遣返工作。二二八事件期間任青年自治聯軍參謀長兼督率指揮官、外交宣傳部主任。事件後得知自己名列嘉義市通緝名單，遂在劉啓光的介紹下前往中國廈門避難數月，才返臺辦理自新，並於臺北經商，1949年被冤指資匪而坐牢5年。出獄後返回嘉義經營建築業。轉引自許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二)》，頁43。

lah，高先生你要出來主持秩序」，另外比較激烈的那一派就是謝雪紅那邊的人。謝雪紅和我父親關係應該是很好。謝雪紅在地方上很活躍，當然她不會說：「我是共產黨、我是共產黨」，他們那邊立場是比較激烈。

在開會的前一天，我爸就找了吳振武和黃華山來，吳振武不知是日本海軍陸戰隊中尉還是大尉，<sup>59</sup> 是臺灣人在日本軍中階級最高的，他是後來香蕉輸日高雄青果合作社理事主席，吳振瑞的弟弟。黃華山我們都叫他「華山伯」，他是萬斗六（臺中霧峰舊正村）的大地主，有一、兩百甲田，大多種樹薯的林地和較少的水田。我們小時候還去過他在烏溪畔，舊正村的房子住過，1961、1962 那兩年，父親在那裡與他合作種洋菇。1991 年他過世我也有去參加他的告別式。他是米穀公會的會長，他提醒父親說：「高先生，現在是無米可吃的時候喔。」二二八之前就聽說臺灣一些糧草和米都被運去中國。吳振武說：「這樣不行啦，這要怎麼打，就算現在日本軍以前留下來的裝備都被你搶去，你也沒辦法和正規部隊作戰」。父親還想到蔣渭水跟他說過，臺灣是一個小島，在日本統治下不可能反抗，現在也沒辦法對抗中國。

隔天一大早六、七點，臺中市警察局長洪字民也來敲門說：「高先生、高先生，聽說要大亂了，拜託、拜託，你要出來主持！」洪字民的請託不是父親真正考慮出面的主因，那時他本來不想理這些事，但想到如果大亂的話，他還是得出來，就這樣他就和吳振武前往「臺中座」參加市民大會。

---

59 吳振武在戰前升為海軍大尉，為日本臺灣籍軍人中，官階最高者。其經歷可參見註釋 18。

到臺中座之後，先是謝雪紅出來講話，再輪到父親講話，他就先罵國民政府，然後罵「十四大哥」。<sup>60</sup> 我們曾經看過鍾逸人寫的《辛酸六十年》，<sup>61</sup> 內容和父親所說有很多矛盾。當時十四大哥在臺中，做了很多很匪類（húi-lūi）的事情，如帶憲兵四處去恐嚇人、取財等。二二八時去圍我們家的就是十四大哥之一的陳平關，他晚上帶領兩臺卡車的憲兵，開到我家外面來包圍。十四大哥的老大就是蔡志昌，鍾逸人好像對蔡志昌還推崇有加。那時十四大哥還有曾慶昇、詹正光等人。二二八那時，父親就上臺罵十四大哥，得到民衆很大的共鳴，所以事後群衆才會跟著他走，這是他和吳振武商量的結果，帶去臺中師專（當時爲臺中師範專門學校）操場，並在那裡解散。父親說，當時他們帶著群衆走了一大段路，群衆已經有點疲累，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安撫、解散他們比較容易。父親當時意識到這樣的群衆活動相當危險，因爲他是老百姓，雖有群衆號召力，但是他沒有指揮部隊的能力，所以

60 依據鍾逸人回憶錄，十四大哥除蔡志昌外尚有徐成、詹正光、李來旺、傅天順、曾慶昇、連福星、陳東興、王賀宗兄弟、賴眼前、魏賢坤、陳平關。參見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狂風暴雨一小舟》，頁 292。

61 對照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上）：狂風暴雨一小舟》，頁 450-451：「戰時擔任過「一心隊」總隊長的高兩貴（總隊附，何鑾旗）竟然也出現臺上，謝雪紅及她們「人民協會」的人也有五、六個。……第二位站出來講話的，是前「一心隊」隊長高兩貴。他人高馬大，聲響如雷，他講的內容是偏於攻擊所謂「半山」之輩。他雖然始終並未指名道姓任何一個人，可是臺下聽眾幾乎都知道他在攻擊那些人。「如果沒有這些『半山』回來臺灣給『阿山』穿針引線，做『阿山』的嚮導幫兇，那些『出外人的阿山』何至壞到這種地步，知道如何敲詐臺灣人，欺壓臺灣人。所以要找『阿山』，應該要先找『半山』算帳。」他講到這裡，臺下便有大聲叫「對」附和，甚至竟有人大聲怒號：「打倒十四大哥」，四起的掌聲終於把他接下去的話掩蓋掉。」

他特別拜託吳振武，請他指揮。父親認為這樣做是對的，但是立場比較激烈的人就非常不滿他。父親也跟我們講很多次吳振武槍傷自己的事情，吳雖一度領導群眾，但他大概知道這樣下去一定會發生問題，因此就決定自己打傷自己，讓自己從這場紛擾中脫身。儘管父親不再指揮群眾，但後來幾天臺中那裡發生事情，父親也都前去排解。

父親還說到外號叫「加納」的何鑾旗要槍殺謝雪紅的事情。日本時代何鑾旗有一次去恐嚇林碧梧，說：「臺中你去找誰都沒用」，結果林碧梧知道加納怕我爸爸，在他家談判那天請我爸也去，加納一到，說：「你怎麼會來？」我爸就說：「馬鹿やろ，加納你不可以胡亂來！」加納就抓抓頭髮，對林碧梧說：「你實在很厲害，我就只怕這個人」。加納是很「性格」的一個人，很狠，但是一種匹夫之勇。他擅常虛張聲勢，靠著臺灣人比較怕事的性格去恐嚇人家，會亮出刀子跟人家恐嚇，說什麼時候他要來拿錢，類似這樣的事情他做過很多。加納的個性是真的「狠」；而父親以前脾氣大概也很壞，譬如說他很愛狗，曾養一隻狼犬，結果被人偷走殺掉，被他知道是誰偷的之後，那個人騎鐵馬時被他抓到，他就把那臺鐵馬高高舉起來，摔到新高會館前橋下的綠川去，最後反被那偷狗賊告到警察那裡，他也是得賠人家錢，這就是父親的脾氣。<sup>62</sup> 父親當時個性剛好剋到「加納」，加上他身高一七〇公分，那時人普遍都只有一六〇出頭，身材又高強體壯，以前還是體育選手，所以「加納」遇到他就先怕他三分了。那次

62 林獻堂至新高會館用餐，得知高兩貴前月被一無賴者以短刀刺腹，幸不致死。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藏「日記知識庫網站」，《灌園先生日記》，1943年11月10日。

何鑾旗和謝雪紅的衝突，若不是父親也在現場，何鑾旗大概已對謝雪紅開槍了。當時謝雪紅要組織反抗軍，急需槍械，何卻把那些槍械拿走。謝雪紅當時對何說你不該拿這些槍械啊，因為這樣的話讓他惱羞成怒，拿著槍對準謝雪紅，打算要開槍。所幸父親在旁邊，就雙手從背後把他抓住，所以才沒法開槍。父親以前說到這裡時，我們都覺得謝雪紅運氣真好。好像以前加納在肢體衝突中曾經吃過他的虧的樣子，所以還有辦法對付他，不然那時謝雪紅就危險了。1949年何鑾旗因為財務糾紛被警總逮捕槍斃，我聽父親說他本來罪不致死，就看有沒有人要保釋他出來，不過在臺中市他人緣很差，沒人要他去保他。父親那時在臺北，自己也才因二二八自新在案，怎麼可能去保他，最後何鑾旗就被人槍斃了。

父親最怨嘆就是他救臺中市黃克立市長之事。二二八事件時群眾群情激憤，有部分人想毆打黃克立。那時父親對大家說：「這是市長，你們不可以打」，群眾才放過他，結果黃克立到南京報告時，說臺中反抗的群眾首領是父親，是「反頭」。那份報告林朝權有看過。林後來當選國大代表時到南京遇到黃克立，他曾罵黃克立說：「高兩貴救你，為什麼你還這麼說？」黃克立說那時群眾亂成這樣，可是他卻有能力命令群眾，當然他就是暴動首領，不然還會是什麼人。

所以我爸從那時候萌生了「臺獨」或與中國分開的念頭，這都是在這樣刺激下產生。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們家住在后里的屯子腳。那是日治末期為了躲避空襲，父親向張信義借的疏開處。某一天，十四大哥之一的陳平關帶領了兩卡車的憲兵來包圍我們家，要抓我父親。

在那之前，父親只隱約知道有人要抓他，因此打算到臺北去避一避，因此陳平關他們撲了一個空。但這件事情把母親嚇壞了，帶著兄姊躲到市府路顏春福<sup>63</sup>宅好幾天。

父親到臺北後，暫居妹妹家與「東邦紙廠」廠房，和工人們混在一起。東邦紙廠就在現在恩主公（行天宮）後面，約在現在臺北市濱江街、五常街那一帶。父親有一段時間是藏在延平南路的臺灣省體育會，<sup>64</sup>當時體育會在現延平南路麗都日本料理的附近。那時擔任臺灣省體育會理事長是游彌堅（按：應為王成章）。我與兄長事後回想，那時政府如果真要抓人的話，應該會很快被抓到，是不是軍警比較「憨慢」，否則何以會抓不到父親，至今我們還不是太明白。父親說那時人跟人之間比較有感情，互信程度也比較高，父親幾個體育界的朋友如林朝權、許尚文、柯子彰、駱水源<sup>65</sup>等都交好，他們幾個人常到體育會陪著我父親聊

63 顏春福（1905-1969），臺灣臺中人。1905年出生於彰化，後移居臺中。臺中公學校畢業後進入臺南長榮中學，畢業後最初於臺中刑務所購買組合任職，1922年加入臺中市青年團，1926年成為副團長。1927年獲得總督府許可得以販售鴉片煙膏，之後活躍於臺中商界，擔任臺中商工協會評議員與寶町「方面委員」等職務。戰後持續活躍，歷任臺中市顏文會營造廠董事長，臺中市商會理事長，臺中市倉庫利用合作社理事長，其顏文會商號位於臺中市市府路36號。參見林進發，《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民眾公論社，1934），頁408。有關其戰後經歷參見陳先輝，《自由中國工業要覽》（臺北：亞洲經濟出版社，1957），頁143。

64 林朝權受訪時提及他將憲兵隊要逮捕的高兩貴躲藏在他親友處。參見葉芸芸撰，〈歷史的播弄——訪台灣先行代體育家林朝權〉，收於葉芸芸，《證言2·28》（臺北：人間出版社，1990），頁123。

65 駱水源（1908-1976），臺北人。1928年臺灣商工學校畢業後，先在臺灣總督府財務局擔任判任級官員「屬」，1939年離職後轉任《臺灣日日新報》金融記者。1945年10月《民報》創刊，擔任報紙之經濟部長。隔年

天、打麻將，排解無聊。

有關檔案管理局留存檔案中記載林朝權在二二八事件時可能受國民黨派來刺探消息一事。<sup>66</sup> 林朝權報告提及吳振武、顏春

---

他競選臺北市參議會參議員，並順利當選。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參與事件處理委員會，一度被列在首謀叛亂名冊中，但並未受到審判。1950年當選首任臺北市議員。除了政壇外，他在1948年擔任臺北市第一倉庫利用合作社理事主席，又和陳逢源等人合組臺北區合會儲蓄公司，並擔任總經理與常務理事等職務。1951年當選臺北市合作社聯合社理事，1955年任臺灣省合會儲蓄事業協會監事。駱喜愛體育，曾任桌球協會總幹事，並在1957年促成我國為亞洲桌球聯盟會員國，並設法阻止中共取代我國在國際體壇上之席次。參見陳翠蓮、薛化元纂修，《續修臺北市志·人物志(政治與經濟篇)》(臺北：臺北市文獻會，2014)，頁98-99。

- 66 訪談當天出示臺史所調閱自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軍管區司令部」，〈為查明吳振武所有組織真相〉，(檔案號：A305550000C/0036/9999/9/1/050)，該件檔案為二二八事件後，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國民大會代表林朝權以臺灣省體育會總幹事之名，呈報告給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報告臺中變亂經過及所做工作請予鑒察由。此次臺中地方有少數亂黨奸徒藉臺北緝煙事件之肇端相從叛亂，經將當時一段情形面報鈞長。迨本月七日鐵路交通恢復，朝權乘早車身赴臺中續查叛亂事情，得悉均為共黨煽動，該黨指揮謝雪紅及其黨羽鍾逸人、楊克煌等乘機糾合不良份子及流亡〔氓〕一百多人陰謀暴動，佔據前時日本第八部隊軍營為司令部，樹號二二七部隊，恃其所奪武器以威脅民眾、學生及警察大隊，且妄圖迎擊國軍，情勢險惡。而所謂處理委員會絕無維持治安、收拾局面之可能，所發言論□□乖謬，蓋以共黨散播謠言，動搖民心，有少數學生徒逞一時之意氣，附和盲從，自以為所有行動皆為國家民族服務，殊不知被亂黨利用，無異自投羅網。當時市縣參議會議長及地方士紳開會，公推臺中師範學校教員吳振武號召學生及消防隊、警察隊等組織保安隊，曉以正義，收集紛散之軍火，納武力於維持治安之正軌，不為共黨利用，死守第三飛機廠倉庫及其他未被劫奪之倉庫，迭次拒絕共黨威迫交管，終歸賴以保全。保安隊組成之後，並由各界人士勸誘謝雪紅等參加以便控制，惟謝等以所奪軍火甚多，人

福、張星賢、<sup>67</sup> 高兩貴、莊加恩、<sup>68</sup> 林連城、廖忠雄、<sup>69</sup> 施金安等於事變期間並無反逆行爲。雖然我與兄長無法得知父親的意見。

數而眾貌合神離，應與保安隊委蛇，而以吳振武阻其發展遂恨之刺骨。八日午夜，乘吳巡邏師範學校附近之際，竟以手槍狙擊，吳之左腿被彈射穿，現留祐吉外科醫院治療。朝權既抵臺中，一面調查叛亂事件，一面邀請臺中體育分會同仁顏春福、張星賢、吳振武、高兩貴、莊加恩、林連城、廖忠雄、施金安等座談，傳達本人所負任務，商討對付共產黨辦法，即決定激動全市輿論，壓制暴動份子，統制青年、學生。是時共黨向肆披猖而卒不能敵正意宣傳之效果，人心不從，使其技無所逞。遂於十二日夜間分乘所劫奪之大汽車二輛、小汽車三輛、卡車二輛，向埔里方面逃竄，約共一百五十餘人，並攜帶劫奪之武器及軍米五十袋，迨國軍開入臺中市之前，體育分會乃分派人員四出宣告民眾安份鎮靜，於是秩序轉好，市面安謐，商店照常開業。」

- 67 張星賢(1910-1989)，臺中人。1930年臺中商業學校畢業後前往東京就讀早稻田大學專門部商科，1934年畢業。在運動方面有相當天份，在學中常常參加相關競技，甚至代表日本參加奧運。1932年他參與奧林匹克運動會四百公尺賽跑與四百公尺障礙賽。1934年在極東奧林匹克會與兩年後的奧運上擔任一千六百公尺接力賽選手。1935年後他在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任職，該年十月轉任華北交通社。之後在北京鐵路任職。參見興南新聞編，《臺灣人士鑑》，頁250。
- 68 莊加恩爲一名鉛球選手，曾參加1928年2月臺中御大典記念救濟會主辦的運動會，參加「砲丸投」(鉛球比賽)擲出11.73公尺(16 pounds)，得到第二名。又於1930年5月台中州陸上競技會投出12.525米(12 pounds)，得到第六名。參見竹村豐俊，《臺灣體育史》，頁341-342。
- 69 廖忠雄(1914-1998)，臺中豐原人，父親廖西東曾任葫蘆墩區長、豐原街首任街長。公學校畢業後入臺中州立第二中學校就讀，後全家遷往日本，於1933年入早稻田大學就讀。1940年返臺於豐原商業職業學校任教，1945年轉任臺中師範學校舍監長。1956年參與豐原鎮長選舉並當選，之後順利連任，後再任第六屆鎮長。豐原鎮改制爲縣轄市後又任第一屆市長。長子廖一久爲中研院院士，次子廖了以曾任內政部長、總統府秘書長。參見許雪姬、楊麗祝、賴惠敏編著，《續修臺中縣志·卷九：人物志》(臺中：豐原，2010)，頁79。



但從林的敘述來看，林反利用政府可能性就很高。換句話說，他雖被賦予監視任務，但反過頭來利用寫報告的機會，說這些人在二二八事件時沒有問題，等於是間接保護了他們。

前述檔案所列的人很多我們都認識。張星賢是締造臺灣三級跳遠紀錄的人，在合作金庫工作，記得他住在天母。莊加恩我不認識。林連城是消防隊長。廖忠雄是廖了以的父親。父親說過，廖忠雄那時會從豐原到臺中找朋友喝酒，喝得太晚就睡在我們家。廖忠雄也是體育出身，不知是排球還是橄欖球，記得有一段時間他還擔任過體育老師。施金安被父親朋友們暱稱為「四斤半」，日本時代也參與社會運動。我想林朝權可能有跟吳振武講國民黨在監視他們，要他注意，所以吳振武藉著槍傷自己，把它說成是受共產黨人報復，比較好替自己辯護跟脫身。所以這樣看來，林朝權接受命令來探聽臺灣人動向是沒有錯的，但是他沒有像林頂立那些人專抓臺灣人，反而向上面說要他去調查的人的好話。

父親還曾經講過，二二八事件時連震東到臺中來想打聽一些事情，似乎有點不懷好意，後來被群眾發現，將他包圍。父親將他大罵一頓，並趕他出去。表面上雖然對他很凶，但其實這應該算是救了他，因為讓他繼續待下去，後來失控的人或者群眾很可能會把他打死。記得在《辛酸六十年》中也有類似說法。<sup>70</sup>

談到李友邦，他幫了父親許多忙。李友邦赴中國前就和父親

---

70 參見鍾逸人，《辛酸六十年：二二八事件二七部隊長鍾逸人回憶錄》（臺北：自由時代出版社，1988），頁482，之後該作者的增版內容並未有此段敘述。

認識，戰後張士德<sup>71</sup>來臺灣組織三青團時，張在臺中地區就找我父親及顏春福、張信義等作為幹部。二二八事件後，父親要被抓時，他向我們提及李友邦一度找王成章<sup>72</sup>和彭德<sup>73</sup>幫忙。當時王

71 張士德(1907-1982)，原名張克敏，字士德，臺中外埔人。日治時期前往中國就讀黃埔軍校第四期，返臺後又參加過農民組合。1931年因左翼運動遭到大檢舉，後前往中國，以「馬士德」名義加入臺灣義勇隊。1945年9月以三民主義青年團名義來臺發展，籌備處設置於原菊元百貨樓上，一度吸引吳新榮、陳逸松等人加入。但該組織在二二八事件後瓦解。他在1956年、1967年兩度欲參加臺中縣長選舉，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1972年參加監察委員選舉，1974年任國家安全局設計委員。參見〈逐鹿臺中縣長有十三人參加〉，《聯合報》，1956年2月25日，第5版；〈中央地方五項選舉 黨內提名登記截止〉，《聯合報》，1972年8月15日，第2版；陳逸松口述，吳君瑩紀錄，林忠勝撰述，〈陳逸松回憶錄（日據時代篇）：太陽旗下風滿臺〉（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頁300-301；曾健民撰述，〈陳逸松回憶錄：放膽兩岸波濤路（戰後篇）〉（臺北：聯經出版社，2015），頁59。

72 王成章，1908年生，原籍江西萬載人。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曾就讀日本大學社會學部，並於日本警察講習所研修。1945年12月擔任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戰俘管理處處長，後兼任基隆與高雄港口運輸司令部司令。他曾經創辦《全民日報》、《今日亞洲》半月刊。歷任臺灣省合會儲蓄公司董事長、臺灣省政府山地行政處處長、臺灣省警政處處長、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改造委員會委員。又1946年6月當選臺灣省體育會理事長，後歷任山地協會、國術會理事等職務。參見《中華民國人事錄》（臺北：中國科學公司，1953），頁19；《中華民國名人傳之四》（1957年5月），頁10；〈台灣體育會 昨舉行成立大會〉，《民報》，1946年6月21日，第2版。

73 彭德(1911-1982)，字志民，苗栗銅鑼人。在銅鑼國公學校（今龍潭鄉高原國小）畢業後，考取臺北第二師範學校（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就讀，後前往日本，於日本大學貿易科及東京商科學校本科就讀，對於商業經濟多有研究。中日戰爭期間，由日本轉道香港，後至上海，1944年協助中國國民黨政府在第三戰區服務，擔任臺灣工作團的教官工作。二次戰後自上海返臺，曾出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執行委員。1946年臺灣省

成章似乎服務於警備總部，也有加入體育會，後來當到臺灣省政府警務處長。我爸被王成章還有彭德解救。彭德和父親究竟是什麼關係，因父親比較少提及，只知道他後來當過臺北市社會處處長和臺北市黨部主委，其他我們就不知道了。

父親還提過警總任職第二處處長的姚虎臣。他都戲稱他為那隻「hō-sîn」（臺語蒼蠅的諧音），在父親向官方辦理自新時，他也花了不少錢打點。花多少錢呢？據他事後跟我們說大概是用金條來算的。這件事情原由就是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在該年三、四月間蔣介石有下一道命令准予民衆辦理自新。父親以這個當理由，請人去和姚虎臣談，當時三青團的張士德也幫了很多忙。張士德因為常來新高會館，後來也有一段時間在臺中住，小時候我們還去大全街他家拜訪。張士德是臺中外埔一帶的人，他提到張士德時都會說他有一點「慳」（báng），很愛喝酒，但對朋友很好，從頭到尾都在幫忙臺灣人。張的小弟在臺北開委託行，也住過我們家。救父親這件事，張士德出了很多力氣才讓父親拿到自

---

參議會成立，法定由各縣市參議會間接投票中遴選出 30 名參議員擔任，為新竹縣第三順位之候補當選人。1947 年受二二八事件影響，參議員流失甚多，人員變動甚大，至 1948 年，張錫祺參議員辭職，遺缺遂由其擔任。1949 年 1 月，陳誠接任臺灣省政府主席，指派其擔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執行委員、臺灣區生產事業管理委員會常務委員與《台灣新生報》董事等職。同年 12 月，吳國楨接任省府主席，任命其為臺灣省政府委員，因而辭卸省參議員職務。之後轉任臺灣省政府建設廳長，但因部分人士反對而下臺，成為任期最短的廳長。後轉任行政院參事，在國民黨曾擔任臺北市市黨部主任委員，中央黨部第五組副主任。後復出任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局長，卸職後即離臺赴美。參見臺灣省諮議會數位典藏資料庫「彭德先生」傳記，網址：<https://www.tpa.gov.tw/opencms/digital/area/past/past03/member0022.html>（2018 年 4 月 20 日查檢）。

新證明。

當時姚虎臣在父親拿到證明時，一度要父親改名加入警總，並幫取名作柯柏賢，要他以上校的身分去上班，等於要吸收他的意思，當然被他拒絕。小時候我們家裡還留有一本警總在當年三、四月發的一本小冊子，上面寫有臺中市暴民領袖高匪兩貴已被逮捕伏法的說法。父親有時候會把這小冊子給來訪的知己朋友看，說這條命是撿回來的之類的話；不過這也代表警總內不一樣派系的人，有不一樣的通報與抓人系統，甚至對抓什麼人有不一樣的看法。這本小冊子一直到 1964 年一次搬家時在母親命令下將其燒毀。

父親以後常說，那段時間真是相當驚險。幸虧有張士德、李友邦、彭德、王成章幫了很多忙。我與兄長曾去過觀音山探望李友邦的墳墓，日本式的。很懷念他。父親和朋友聊天時都會很自然地講起這些陳年往事，所以我都記得。後來 1979 年我第一次去沙烏地出差的時候，在那裏買了一匹當時流行的絲絨布料，要給我母親，我母親看了說這布料很高級，說她早年曾經去迪化街買這種絲絨布，送去李友邦家。所以父親與李友邦的關係是純粹朋友的關係，只送一塊布就是對救命之恩的一種答謝。

父親取得官方發給的自新證明是在 1947 年 7 月 4 日。取得證明後沒多久剛好遇到他的好友顏春福要娶媳婦。顏經營當時臺中最大的營造廠「顏文會」，父親想說既然已經取得證明，就答允參加。當時臺中市警察局長已不是洪字民，而是新任的警察局長。<sup>74</sup> 那位局長見到父親就說：「高兩貴，你是通緝要犯」。作

---

74 洪字民繼任者為陳錦庭。

勢馬上要抓拿父親，父親就說他已經自新了，誰知那位警察局長就說：「要自新的話你去跟警備總部自新，我這裡你的案子還沒銷，我要逮捕你」。顏春福這時跳出來說：「拜託啊！今天我這裡娶媳婦辦喜事，你在我這裡要抓人，你這是什麼意思？」結果這個警察局長就說：「好吧！我今天不抓，但是以後只要你進到臺中我一定抓你，我不管你自新了沒」。原先父親訴說這段事情的時間不是記得很清楚，但剛好顏春福的孫子和我是臺中一中初中部同學，經過確認後才知道結婚日期。

父親戰後不在臺中發展，除了這個原因外，另外一個不留臺中的因素就是餐廳開不下去了。因為政治問題，讓餐廳無法經營。例如二二八事件後十四大哥中的蔡某帶人來餐廳，對著餐廳職員放話說：「高兩貴，你再 chhèng（踐）嘛，怎麼現在不繼續 chhèng 下去，這樣啦，去跟你老闆講，叫他拿幾條黃金出來，我包領他沒事」。那時父親（老闆）跑路，憲兵又常來餐廳搜查，餐廳幾乎無法營業，最後只好結束營業。

1979年2月11日傍晚，鍾逸人到家找父親，我也在家。留著長頭髮的他，說已經60歲了，但看起來年輕許多。他說228後先被判死刑，最後被關了18年才出來。他告訴父親現在的家庭狀況，還算不錯，父親也為他高興。不久兩人就談二二八事件，提到許多舊識，逃亡到中國、日本，有些被捕後服刑、槍決，不勝唏噓。接著談二七部隊，父親告訴他，一開始大家都想拚，所以臺灣到處都有義勇隊的組織，但到最後因為實力懸殊，只好放棄，以臺中來說，市民大會前，他曾找吳振武和黃華山過來，一齊評估武器、彈藥、糧食與人員的對比，實在差太多，不能帶著熱血的市民去送死，所以他和吳振武只好去作在當時不

得人心的疏導和解散動作，但沒想到鍾他們幾位還是去組織二七部隊，結果是謝雪紅他們順勢接管。我父親說，幸好謝雪紅他們放棄得早，落跑得快，否則真正大打起來，臺灣中部會很慘。鍾說，他們之所以堅持，是認為國軍應該不堪一擊，會有機會戰勝；父親則說除非有外力，很難掙脫中國的控制，而那時的臺灣人根本不會想到會有其他國家，如美國來幫助。<sup>75</sup>

父親過世前約二個月，有一個上午鍾逸人又到臺中順天醫院來看我父親，那時我父親已經很孱弱，所以他第一句話就問父親：你還認得我？父親點頭，所以他們又開始對話，還是講二二八的事情，這次大多他在講，父親有時勉強回應幾句而已。鍾提起二七部隊還是很興奮，大概半個鐘頭，鍾請父親保重，就離開了。

我們曾經問父親鍾逸人與二七部隊到底怎麼一回事，父親講：「哎唷，他都是在想不可能的事情，他認為他可以打贏國軍。二七部隊也許是他發起，但還是謝雪紅作主。」父親的意思是說，謝雪紅他們是「紅頭」（共產黨），一直想要把事件擴大，犧牲臺灣人無所謂，從她動亂時到處要搶軍械彈藥就看得出來，鍾逸人他們發起武裝對抗，謝雪紅他們當然呼應，馬上進來拿走指揮權，二七部隊因謝的領導一陣子看來聲勢很大，但不久馬上解散，這是謝和他們因自己組織利益的決定，鍾應該不會有什麼置喙的餘地。二七部隊的行動幸好沒造成本身、國軍和平民太大的傷亡，加上有謝雪紅的參與，大家諱莫如深，所以不太有人知

---

75 本處鍾逸人來訪之日期、時間與兩人討論內容，參考高銘堂先生的日記內容進行整理。

道。

幾年後我們看了鍾氏的回憶錄，才發現他都用有主觀評價的語言來形容臺中這些主張穩重，走溫和抗議路線的前輩。終戰後的那幾年，父親他們就從日本時代一齊從事社會運動，後來到中國參加不同黨派政治活動的老朋友口中，多少了解那裡政治鬥爭的殘忍與極端，對敵對黨派固然是血腥鎮壓，對無辜平民也是濫殺荼毒，在臺灣大規模的武裝暴動會引起屠城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也是那時大多數的地方意見領袖的看法。他 1979、1980 年兩次來找父親，客客氣氣的，又帶著幾分尊重，看來應是心情上已有沉澱，但他對我父親當時直接告誡他們不要妄動，因此遭他們拔刀相向的一事，居然以「膽小如鼠」這類負面字眼放在幾年後的回憶錄上，實在令人不能理解。

再如鍾逸人書中講張士德，這個出名好人的部分，描述也很負面，「高兩貴居然把我的事情告訴張士德」、「(張士德)便惱羞成怒地開始拆穿我的假面具」，張士德其實是想要救他，勸他不要跑來跑去，要躲起來，如果躲不掉，還想帶他去柯遠芬那裡好好解釋，是要救他的；張士德，如要抓他，就如他書中寫的，旁邊有一位上尉和二位士兵，還不容易？當時有些「半山」憑自己的黨政軍關係，在事變前後救了不少人，如張士德就是。

問題是二二八時身歷其境，在激進對抗與忍辱暫時屈服之間做無奈選擇的許多地方意見領袖，在解嚴時，都已作古，沒有人從其他角度來詮釋歷史。但至少我父親的回憶，臺灣人除了少數如十四大哥中幾位特別囂張的，地方士紳以及一般民衆都是善良，只要可能，都是盡可能幫忙別人；固然有少數人以暴力加諸外省人，也只有開始那麼一陣子，經過勸導，大多數的情形群

衆都能回歸平和。但在標榜「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中國文化裡，不管你怎麼溫和、合理，只要你是地方頭人，會有影響力的，事後也要受到追究，如前面所說黃克立市長控訴他救命恩人高某人的邏輯。所以我父親就說不管激烈與溫和，臺灣人好像怎麼走都不對，因為臺灣前面與日本，後來與中國大陸有了政治的連結，在大國壓制之下，很難掌握自己的命運，李登輝對司馬遼太郎說的「場所的悲哀」，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吧？

1947年底選制憲國民大會代表時，父親回到臺中幫林朝權競選。林在競選時充分利用了父親的人脈，也因此擊敗了原先大家看好的林湯盤。當時競選的總幹事是顏春福，副總幹事是父親。聽說顏春福和林朝權有姻親關係，最早也是由顏介紹林朝權與我父親認識的，家中還保留一張林當選後在顏文會門口，地址在臺中市市府路109號的助選團隊大合照。林當選後去南京參行憲首任總統的選舉，他傾向李宗仁，還向李宗仁要了一個簽名照送我父親，後來李宗仁1960年代回歸中國後，母親和我們把照片燒掉了。

李宗仁在1949年底逃往美國後，林朝權大概覺得不安，又看那時中共會隨時打來臺灣，所以到香港，藉機轉往中國。他最後要去香港的費用也是跟父親借的。依稀記得林朝權太太好像留在臺北，沒有去中國。解嚴以後聽說林有回臺灣定居，<sup>76</sup>臺北體大的雷寅雄教授曾經去訪問他，說他過著相當孤寂的生活，可惜我們知道得太晚，不然可以找他聊二二八前後的往事。

76 經查葉芸芸撰，〈歷史的播弄——訪台灣先行代體育家林朝權〉，收於葉芸芸，《證言2·28》（臺北：人間出版社，1990），頁119-130，並無提及林朝權曾回到臺灣。



聽父親說，1950年吳國楨擔任臺灣省主席時提及要放鬆對臺灣人的桎梏，並請蔣渭川接了民政廳長。蔣曾跑來找父親說：「老高、老高，不然你來我民政廳幫忙，當個『視導』」。父親反問他：「你說吳國楨現在要鬆綁對臺灣人的控制，是放鬆到什麼程度？」蔣渭川對父親說：「這是絕對機密，不能說」。父親生氣說：「你自己都不知道答案，那我何必還要去」。後來不久蔣渭川就離職了，廳長一職才擔任幾十天。這是戰後那幾年父親牽扯到政治的一些事情。

到臺北之後，父親做生意也失敗，還有被朋友騙，種種原因讓家境開始困頓。約在1950年代父親曾經營過煤礦，但還是沒賺錢。因時代變化，商場風氣、交易習慣已經不一樣了，早期大家做生意口頭承諾就夠了，戰後就不行。父親就是作生意跟人合股，被人家騙去。譬如那時要從日本進口洋蔥頭時因外匯管制，要辦「結匯證」，父親被人騙說要拿出多少錢來買那張證。那人也是他小學同學，父親拿了幾萬元給他。他一直說貨還沒到，事實上那些貨已經到了，被他賣掉了，連本錢都被他騙走，然後他就跑去日本，這次洋蔥事件是壓垮我們家經濟的最後一根稻草。那時父親本來準備用這些錢買現在南京西路新光三越對面的一棟別墅，後來當然買不成。

另外還有一次是他當信用合作社經理時遇到朋友拿金子來，想跟父親質押借錢，他因信任朋友就放在保險箱，最後沒還錢時父親要查驗金子時才發現其實裡頭是灌鉛。他說這種事情日本時代不可能發生。我們認為，家裡之所以困頓要怪二二八，但也不全然能怪這個事件，父親也沒注意到時代不同了也是原因之一。戰前戰後，人心、人性都不一樣了。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顏春福身上，前面說過「顏文會」是中部最大的營造廠，顏先生在 1956 年與全國營造公會聯合會理事長祖展堂<sup>77</sup>先生，代表臺灣到馬尼拉參與「亞洲暨西太平洋營造業公會國際聯合會 (IFAWPCA)」的創立，由此可知他在工程界中的聲望。但他們自國民黨政府遷臺後所承攬的公共工程，施工、驗收都發生了問題，眼看其他人馬虎施工的工程都順利驗收，拿新工作也都沒有問題，「顏文會」卻每下愈況，到了 1960 年代依舊如此，只好把這個有歷史的營造廠收掉，就是人心、人性和日本時代都不一樣了。

## 六、戒嚴後期再次接觸政治

二二八之後，雖然我父親已經自新了，但之後像是潘欽信等人，如果他們過世、或出了什麼事、誰在香港、中國、日本怎麼了，警備總部或調查局都會調他去問話。甚至到了 1970 年謝雪紅死了，還是 1974 年陳逸松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sup>78</sup>都跑來問他最近有沒有跟他聯絡？所以父親始終

---

77 祖展堂，1913 年生，河北昌黎人，天津工商學院建築系與日本自由學院土木工程系畢業，在中日戰爭期間於淮海地區進行工程。1945 年後歷任天津市裕國公司常務董事兼總經理、天津市營造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中華民國營造工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常務理事。1948 年任天津市參議員，隔年並擔任天津市地方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與城防建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來臺後主持裕國公司，並承接部份美援工程。參見《中華民國人事錄》，頁 183。

78 1974 年陳逸松擔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參見曾健民撰述，《陳逸

不主動碰政治，直到 1968 年林澄秋<sup>79</sup> 競選臺中市長，他才又開始接觸政治事務，那時叫黨外運動。

事情的起源和「十四大哥」的首領蔡志昌有關，當時蔡和國民黨提名的林丁山<sup>80</sup> 角逐臺中市長，蔡志昌在四年前的選舉輸給張啓仲，想要捲土重來，誰知道蔡志昌在聲勢很大情形下突然放棄競選。當時謠傳是受了林丁山「特殊壓力」而放棄。蔡志昌和我父親可說是因二二八結有冤仇，蔡志昌手下的大將陳平關，就是二二八時帶領憲兵隊來包圍我家的人，也是十四大哥中的一員，結果是他跑來找我父親，說他不甘願被蔡志昌「背叛」，跟父親說他們要出來幫林澄秋助選。

其次，林澄秋是臺中高農的老師，他有一個學生叫作林長興，父親在臺北經營煤礦時，林長興的丈人與父親有往來。他本人也和父親很好，林長興後來搬來臺中當代書，化名林敏慎，為他的老師林澄秋助選，林澄秋這個人個性很古意 (kó-i)。雖然要

---

松回憶錄(戰後篇):放膽兩岸波濤路》,頁219。

79 林澄秋,1908年生,臺中人,嘉義農林學校畢業,東京農業大學畢業,戰後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就任省立臺中農業職業學校校長,後任臺中市政府建設局長,參與臺中市第六屆縣市長選舉。參見行政長官公署人事室編印,《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錄》,1946年7月,頁283;《中華民國選舉概況》(臺北:中央選舉委員會,1984),頁449-455。

80 林丁山(1920-1996),臺中人,公學校畢業後前往日本求學,就讀於青山學院中學部,後考上拓殖大學。畢業後再入日本陸軍預備經理學校,獲得主計少尉軍銜,並至滿洲國服役。戰後返回臺中,先任臺中市西區區長,後競選議員當選。1968年獲中國國民黨提名競選臺中市長,但失敗收場。他之後陸續擔任多所金融機構監事主席、經理。除前述職位外,他還擔任了臺中市棒球委員會主委長達六十年時間。參見國立中興大學編著,《臺中市志人物志》(臺中:臺中市政府文化局,2008),頁46-47。

參選，卻不太會處理選舉的事情，都是林長興幫他處理。因為這一層的關係，我父親也願意幫忙林澄秋競選。那時我家經濟狀況較差，眷村中租屋較便宜，我們就租在精武路，是個有院子的房子，地方較偏僻。那時林澄秋爲了擺脫國民黨的跟蹤、騷擾，認爲軍眷區反而比較安全，於是每天大約晚上十一點多，林澄秋跟其他人會陸續騎腳踏車到我家開會，過半夜才散。投票前連續幾個禮拜都在我們家開會，林澄秋本人也幾乎每晚必到。

結果，林澄秋一戰成功，黨外力量開始集結。我曾經看過一篇文章，寫說臺中「黨外」在民國四十幾年常常在高兩貴家裡秘密集會，這敘述時間上不對，民國四十幾年時，我們還住臺北，但是有這個在我家集會的事實，是林澄秋的競選。後來，父親在《臺灣新聞》的同事何春木<sup>81</sup>也常來向父親請益，有時住彰化的前縣長黃順興到臺中找他，他也騎一部50cc摩托車載黃順興到我家找我父親聊天。何那時一直罵國民黨，尤其是黃在短波廣播收聽到什麼消息，如陳逸松去北京、被任命爲人大副委員長、到美國去等等的消息，一定跑來臺中找老朋友開講；他最後一次來，我也在，他說他和黃石城協調選縣長，因對方堅持，他爲大局著

81 何春木(1922-2017)，臺中人，外號「黨外檜木」。何家族經營木炭生意，家境尚可，公學校畢業後入「臺灣新聞社」任職，後轉任「高雄新報社」任職。其29歲時當選臺中市議員，爲當時最年輕議員，後共歷任四屆議員。另外他當選過第六、八、九屆省議員。1960年他曾參選臺中市長，但輸給邱欽洲。1979年擔任省議員期間，他曾經質疑「南海血書」的真實性。其子何敏豪、何敏誠分別擔任過立法委員、臺中市議員。參見《總統府公報》，7307號(2017年5月31日)，頁3-4；林良哲，《何春木回憶錄：「黨外戰將」奮發開啓人生的故事》(臺北：前衛出版社，2004)，頁75-78、247-248。

想，不得不退，說得義憤填膺。何春木後來競選市長、省議員，父親都積極參與，那時已不去管戒嚴的束縛了。

在 1950 年年代，「十四大哥」之一的陳平關有次被父親在街上遇見。當時父親曾問他：「二二八那時候爲什麼帶憲兵來圍我們家？我和你無冤無仇，爲什麼要這麼做？你若對我有什麼不滿，那麼我們兩個人，一人帶一把鋤頭到山頂決鬥，誰死了，鋤頭挖一挖，把對方埋了」。陳平關趕緊向他道歉，我爸爸是那種可以一笑泯恩仇的人，所以陳平關他們與蔡志昌「決裂」以後，就比較常來找我父親聊天。後來陳平關在我父親要辦告別式的時候，主動來找我，跟我說：「喝！你爸實在很兇、很兇！我看到他就驚！但他是少見的人格者，我佩服他。」幫了很多忙，告別式時他還志願當司儀。

陳平關後來幫忙管理臺中寶覺寺，他妹妹嫁給寶覺寺的住持林錦東，我們當時都稱林爲「錦東師」。寶覺寺是屬於日本佛教一派，日本和尚是可以娶妻生子，錦東師過世的早，他妹妹沒法處理寺務，只好請陳平關代替主持寺務。「十四大哥」裡頭的幾個人如詹正光，他 1961 年曾租我們家隔壁。那時他和女兒帶一個賣藥的歌舞團，團員好幾個人，有吹小喇叭、薩克斯風、可以表演短劇、變魔術，生意好像不錯。聽說他們父女每天要吃一隻雞，這在當時是很奢侈的生活。曾慶昇常騎著一部老摩托車，推銷一些小東西，看來慈眉善目，講話很優雅，決不會讓人聯想到曾是位大哥，他有一位在四健會工作能幹、孝順的好女兒，時常被掛在嘴邊。連福生後來也常參加父親發起的黨外餐會，也數次參加與關中的溝通。他們幾人，到後來和我爸都不錯，這些人二二八後，有的甚至也被國民黨抓去關了，到後來都和我父親恢

復友誼。但是只有蔡志昌沒有。

何春木是父親「電通社」的後輩，「電通社」的臺中分社後來改稱「臺灣新聞社」，何春木十幾歲的時候就在那裡工讀，常跑來我家拿父親寫的新聞稿。我手上現在還有一份他們《臺灣新聞社》的通訊錄，<sup>82</sup> 這個通訊錄是民國六十八年（1979）編的，這個通訊錄上的幾個人，像歐有財是梧棲新天地餐廳的老闆，那時五十五歲，我父親是七十四歲，何春木那時是五十八歲。本來我想我父親那時的電通社規模應該沒有很大，但後來看這通訊錄上的名單，員工前前後後也不少人。如李國楨<sup>83</sup> 也是以前的員工，

82 通訊錄內記錄原《臺灣新聞社》同仁的名單：高兩貴、歐有財、何開三、賴金清、賴春德、楊梓忠、魏金柱、賴東槐、李再寬、陳白、陳火成、賴金標、林葆謙、林淵泉、廖梓、賴春海、何春木、賴金樹、林應爐、何西東、邱煒煌、林如崧、林茂盛、紀朝炎、陳榮華、林森、楊維慶、楊秋南、楊燕卿、林增壽、王廷錫、賴義、林樹榮、黃文揚、曾煙能、陳清標、陳朝會、張子明、周嫵、王阿來、陳金文、賴呆、巫永福、陳朱彩藝、賴木桂、陳家暉、李國楨、邱雲馨、何水泗、林讓、楊林燈輝、陳長庚。內容有年齡、原職、現職、電話、住址資料。（高銘堂先生提供）。

83 李國楨，南投草屯人，1937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法學部。1945年被任命為臺中縣大屯區區長，南投縣設縣後，轉任縣政府自治指導員與民政局長。並當選第一屆南投縣民選縣長，1954年連任直到1957年卸任。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曾在1955年1月對他做出減俸兩成，一共執行10個月之行政處分。1955年7月，他因辦理土地事務被縣民認為違法，最後因證據不足獲判無罪。縣長卸任後，被派任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檢驗局局長，又涉入中興新村土地徵收案中，遭到檢方起訴，但再度無罪。當時負責此案之檢察官黃向堅因不滿一審判決決定上訴，卻遭到該院首席檢察官延憲諒批駁：「奉命不上訴」，黃不服，因而越過首席檢察官自行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在司法界引發重大風波。究竟是否受到政治壓力，延憲諒自始至終均未能說明。司法機關在調查後，認為延涉嫌偽造文書，移請新竹地檢署偵辦，但最後給予不起訴處分。李國楨案由最高

他作過南投縣長，他有一個歷史留名的案子「奉命不上訴」，李國楨不知是犯了什麼違法的事情，結果檢察官行文說「奉命不上訴」，是臺灣司法史上的奇事。

再來談到國民黨關中和黨外溝通的事情。關中要去各地溝通時，曾經問過吳三連，到全島各地該拜訪什麼人？吳三連就叫他來臺中找父親。這事關中親口跟我父親說的，有一段時間我父親就和關中常有溝通。到了美麗島事件後，關中就很少來了，僅有的一、兩次，姿態也比較高，但我父親一直求他要向高層轉達群眾希望要釋放這些被抓人們的要求，大家都看出關中根本在作假溝通；但我父親不死心，有一次還自己上臺北找關中請命，請黃越欽、唐屹等教授作陪，因為他實在捨不得這些臺中的一些年輕朋友被關。

---

法院確認發回高等法院更審，但最後仍無罪，他並在 1967 年復職擔任省府參議。李案為臺灣司法史上經典教材，甚至在數十年後被法務部放入法務部文物策展作為案例，但該舉動又引發李國楨遺族不滿，認為李國楨並未被判刑。參見早稻田大學校友會，《會員名簿（昭和十八年）》（東京：早稻田大學校友會，1943），頁 695；〈李國楨等 均判無罪〉，《聯合報》，1956 年 6 月 28 日，第 3 版；《臺灣省政府公報》，44 年春字第 11 期，頁 142；〈中興村土地案 臺中地院宣判 李國楨獲無罪保釋 何西就等分別判刑〉，《聯合報》，1958 年 5 月 1 日，第 3 版；〈不上訴奉誰之命 司法界一定要查 檢察長下令查三點 司法部將予適當澄清〉，《聯合報》，1958 年 11 月 23 日，第 4 版。〈延憲諒受懲 議決書送出〉，《聯合報》，1959 年 2 月 7 日，第 4 版；〈不上訴奉誰之命 司法界一定要查 檢察長下令查三點 司法部將予適當澄清〉，《聯合報》，1958 年 11 月 23 日，第 4 版；〈前任南投縣長 李國楨復職 任省府參議〉，《聯合報》，1967 年 8 月 10 日，第 2 版；〈「奉令不上訴」無罪結果被掩蓋 法部文物展突顯檢察官抵抗上級干預 被告遺族不滿 指遭二度傷害〉，《聯合報》，2007 年 3 月 5 日，第 A8 版。

再講美麗島事件時候的黃信介。因為叔叔高六龍和堂姊高惠子選臺北市議員，大家都在大同區選舉。黃信介是大龍峒那一帶的人，他自少年就認識我父親。黃的舅舅是連溫卿，因為這層關係我們兩家很早就認識了。《美麗島》雜誌要在臺中發行時，黨外朋友也來找我父親掛名。所以我的這些相片中有黃信介、呂秀蓮、姚嘉文等人與我父親的照片。後來我六孀的告別式上，他剛出獄，應邀致詞，介紹我們家族時也提起我爸爸，說這是他黨外的老前輩，要是還在，一定是民進黨的大老。

當父親開始接觸「黨外」的時候，1968、1969年開始，調查局就開始又派人來訪問，一、兩個月一次。《美麗島雜誌》發行時期，監視更為嚴密，變成兩個禮拜一次。一開始姓蘇的來，還



1979年10月「美麗島雜誌社」於臺中大里分社成立慶祝會（前排左起為高兩貴、黃信介、黃天福、蘇洪月嬌、何春木、呂秀蓮、姚嘉文與張俊宏）



有好幾個自稱是黨外的人也常來，那時我也知道他們的名字，知道他們可能誰是調查局保防組的「細胞」，黨外在辦活動時這些人也出出入入，幫忙湊人數。一開始調查局派來的多是「老芋頭」，就會時時刻刻「提醒」你，他是有權力的人，像一位張姓的調查局人員，最後一次來時，告訴我們以後會換別人來，但指著我們家裝飾櫃擺的一套從新高會館時代留到那時，捨不得送進當舖的英國骨瓷咖啡杯壺，說他自第一次來就看上了它，希望我們能送他作紀念品，母親心疼說不，但父親還是說沒關係，送給了他。第二天起家中櫃子裡較有價值、有紀念性的東西就都被母親收起來。晚期的調查員都是大專學歷，是透過考試考進來的，不管他們內心怎麼想，但對我們的態度都很好。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情治當局要調父親去問話，父親當時很生氣，不肯去。1977年父親騎鐵馬被一輛摩托車撞到，留下後遺症，有跛腳。最後調查局常常來訪問他的蘇先生出來打圓場，說高兩貴行動不便，讓他們保防組和其他情治機關的人來我家問話就好。那些情治人員問他時，父親就說：「我怎麼會知道（他們要幹嘛），我只是當他們的顧問」。唯一一定要扯到他的事情，就是美麗島事件發生的前一個禮拜，黨外有在臺中的太平國小舉辦集會，父親當時上臺接受介紹。結果情治單位沒有動他，但是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對他影響很大，他心情變得很不好，開始抽菸，行動又不便，沒多久就生病了。那時父親身體變差，去檢查才知道是癌症，癌症進展得很快，隔年初（1981）就過世了。過世的時候，黨外人士很多人說要來幫忙，因為當時集會活動都受到很多限制，希望趁這個機會，把這場告別式辦得盛大一點，讓黨外的人一起來聚會，我那時也不反對。後來在訃聞上的治喪委

員列了很多人，有的我不是很熟，那時沒被抓去的黨外大概都列名為治喪委員。<sup>84</sup>周清玉和許榮淑在他住院的時候都有來探望他。張子源<sup>85</sup>後來當上市長。

告別式一開始，由警備總部的臺中警部司令常持琇，<sup>86</sup>在告別式開始前二十分鐘，就先來祭拜，意思是你們這些黨外今天不要鬧事。當天公祭，由康寧祥替父親作生平介紹。旁邊有軍警在

- 84 訃聞內的故高兩貴先生治喪委員會名單：主任委員何春木，副主任委員曾文坡、張深鏞、許榮淑，委員尤清、江克能、巫永昌、何春樹、何朝安、李和周、李明憲、吳城、吳哲朗、杜木生、周清玉、周賜斌、林茂盛、林助、林慶、洪昭男、唐屹、康寧祥、張啓仲、張士德、張光儀、張子源、連福生、陳慶星、陳彩龍、陳癸淼、陳平關、陳來溫、陳文輝、馮汶波、游朝陽、黃順興、黃天福、黃煌雄、黃綉花、黃碧祺、楊遠、楊孔融、蔡榮標、蔡榮原、蔡伯堯、蔡篤驛、劉火旺、劉賢來、賴茂洲、賴春泉、鄭世和、廖榮祺、魏玉麟、魏吉助、羅榮貴、蘇秋鎮、鐘應承，總幹事何開三，副總幹事林子玉、廖竹和。（高銘堂先生提供）
- 85 張子源（1942-2010），臺中南屯人。臺灣大學畢業後，以第一名成績通過律師考試，並於臺北開業。之後赴日深造，獲得日本名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76年回到臺中開設平民法律服務中心。他在國民黨推薦下參選臺中市長，並於1985年當選，主要政績有改建第一市場、推動經國綠園道健行以及愛心媽媽服務隊。1988年國民黨面對來自民進黨的挑戰者許榮淑，要求他退出連任選舉，原黨部欲以洪昭男取代提名，但後由林柏榕出馬競選。張卸任後陸續擔任國營事業委員會副主委、中國石油董事長、總統府國策顧問。在核四風暴時，他曾經居中協調國、民兩黨紛爭。參見〈前臺中市長張子源辭世23日追思會〉，《聯合報》，2010年5月20日，第B2版。〈臺中市長選舉依然複雜〉，《聯合報》，1989年7月17日，第2版；《總統府公報》，第6924期（2010年6月2日），頁44-45。
- 86 經查受訪者提及的常持琇於美麗島事件期間擔任警備總部的南部地區警備司令，事件後調升為警總副司令。參見〈黃信介說明高雄事件經過聲稱希望不再發生類似案件〉，《聯合報》，1979年12月13日，第3版，〈新任警政署長何恩廷明就職〉，《聯合報》，1980年6月1日，第3版。

一旁警戒，後來我們出殯的車隊出發後，幾乎一路都是綠燈，意思就是要你早點結束的意思。統派王曉波也有來，張溫鷹的母親黃綉花一直幫很多忙。當時算是全省的大政治集會，出席的有後來當選立委的陳文輝，以及蘇秋鎮、黃玉嬌、范政佑的太太與家人，金龍少棒領隊陳慶星、高玉順、關中、黃越欽與替他開刀的洪文棟等人。

## 七、對人物的回憶及評價

翁澤生和我父親很好，前幾年我有買一本何池著的《翁澤生傳》，裡頭寫父親寫了很多的事。那時翁澤生回到臺灣就來找我父親，算是他的知己，我也不知道他們為什麼感情這麼好。翁澤生後來回到臺灣，也死在臺灣，我父親知道後非常怨嘆，說他居然不知道他被關還有病死的事情。父親還提到翁澤生和潘欽信的事情。他和潘欽信本來也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因為翁澤生潘欽信兩人之間的私事，所以對潘欽信不太諒解。

另外較常提到的是王萬得，他說在日本時代社會運動的抗爭，王萬得大概大他們幾歲，顯得較為穩重，但二二八事件後王留在臺灣想打游擊戰，配合解放軍登陸吧！後來也逃回中國。父親1980年生病時，有一位來自美國，自稱是七堵人的楊煥西來找他，告訴父親他與王萬得很熟，剛從「北方」來。父親那一輩談話間，常以「北方」代替中國。說王要他代向幾個老朋友問好，父親怕他是國民黨的反間，來套話的，因此就虛與委蛇，但事後告訴我，對方講的話雖模模糊糊，但真有那麼味道，很像是

王萬得講話的口氣。到了1983年1月，父親已過世兩年，報上登載了「楊煥西通匪案」。<sup>87</sup>我才想起這件事，照報導楊煥西穿梭兩岸，去見老朋友王萬得，應該是真的。但在當時那種氣氛下，他打聽出父親住那裡，而且應該還有去打聽很多老人吧，實在很膽大，還好，他被抓後，並沒有供出他與這些老左派的接觸，不然國民黨又要抓人了？另一方面，當初王萬得與父親的感情好，有人志願要替他傳話，王大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傳給高兩貴吧？胡柳生經香港去南洋，曾經寫了一張はがき（明信片）給他，但之後就沒有消息。

以前聽父親說不少蔡孝乾的事，他說在蔡孝乾投降以後，有一次在路上遇到他，父親看了他一下，蔡孝乾也看了他一下，之後蔡頭就低下來，沒有互相打招呼。他說蔡孝乾這個人私生活不好。習慣詛咒給別人死。父親曾經納悶過，想說為什麼他不自殺？他應該有這個機會，一些朋友被他害死，至少幾百人，都是高級的幹部。相較之下，父親對謝雪紅比較有好評。

父親還曾提過莊泗川，莊泗川後來就不碰政治了，作生意去了，創辦「津津味素」，父親曾經不知道爲了什麼事情去找過他。張信義，我們還記得父親都稱呼他爲「大箍信義阿」，父親和老朋友談往事時，常提到他。印象中好像很小的時候，有一個

---

87 依據1983年1月報紙記載，楊煥西被國民黨政府認定和中共有所勾結，甚至亦將王萬得視爲是臺灣共產黨的重要角色。楊並和蘇新、陳逸松與王萬得等人往來密切。自報紙的陳述來看，楊與王應該認識。參見〈楊煥西與共匪勾聯案偵查終結 軍事檢察官聲請交付保安處分〉，《聯合報》，1983年1月29日，第3版；〈王萬得是台共重要頭頭〉，《聯合報》，1983年1月29日，第3版。

人來我們保安街的家，坐在一張沙發椅上，以前沙發比較小，兩人位的沙發椅他一個人坐剛剛好。很大籬 (tōa-kho<sup>8</sup>)，應該就是張信義。

父親他們戰爭疏開時，去住過臺中墩仔腳的張信義家，一直到二二八以後，張仍是那裏的大地主。林碧梧、林碧滄他們則是鄰近神岡的大地主。<sup>88</sup>聽說張信義被關幾年，放出來以後變了很多，不久就過世了。一個無憂無慮的紳士肯為理想正義做這樣的犧牲真不簡單。

楊達雖然和父親熟識，並沒有常去我們家，但是都會保持聯絡。楊達後來也都待在東海花園農場，我妹妹瑞鏗讀東海大學都會去看他，楊都會藉我妹傳話，問說你爸好嗎之類。因為父親行動不便，被機車撞了之後也都不能走了，只能拿拐杖勉強走路。葉陶我父親是沒有特別提她。有時就「楊達葉陶、楊達葉陶」連著說。葉陶很現代化。我妹妹去東海時也都會找她聊天。我父親的告別式楊達也下山來參加，但過了沒幾年，他也走了。

另外劉啓光<sup>89</sup>與華南銀行的事情。劉啓光是嘉義六腳人，他

88 高銘堂先生追記：碧滄是中興大學熱帶農作物的世界級教授，他太太林瓊娥女士與家母在未出嫁以前即為好朋友。

89 劉啓光(1905-1968)，字明遠，嘉義六腳人，本名侯朝宗，家中排行第六。嘉義商業學校畢業後擔任臺灣農民組合中央委員、臺南州支部聯合會代表。在1929年總督府展開的全面逮捕行動中被抓，並和簡吉因違反「臺灣出版規則」遭到判處2個月有期徒刑。日後他前往中國，1936年他在冀察政務委員會任職，中日戰爭後轉往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任職，在他寫給朱家驊信中卻又說他長期任職調查統計局。1940年出任臺灣義勇隊幹部，臺灣革命團體聯合會秘書長。其身分從日方立場完全轉換為中國政府立場。戰後曾任新竹縣長，後出任華南銀行董事長，並兼任行政院設計委員會委員和臺灣省政府委員，也擔任過一屆臨時省議會議員。參

大姊侯春花好像也是政治家。

高何謙先生補述：有一次，同學跟侯春花介紹我是高兩貴的兒子，她說她知道高兩貴。她說總統官邸旁有一塊土地是她們的，當時她把那塊地賣掉。

劉啓光是陳儀的乾兒子，照父親他們的說法，劉啓光是妄想要大東信託、華南銀行。所以父親曾經跟陳忻說：「劉啓光要對你不利，你要注意一點。」結果陳忻不在乎。劉啓光稱呼陳儀叫「おやじ」（老爺子之意），劉啓光曾經跟父親說：「我常對おやじ（陳儀）說如果要管理臺灣人，用岫梳夾仔（sàu se gim á，竹掃把的前端）是沒有用的，要讓他上刀山、浸油鍋」類似這樣的發言。所以一次遇到劉啓光，父親就跟他說：「啓光兄，我們現在流行一句話，你知道嗎？」劉啓光答說不知，他就說：「擁護侯朝宗，打倒劉啓光」。劉啓光聽了之後非常生氣。意思是農民組合時代的侯朝宗是受臺灣人歡迎的，現在的劉啓光已不是大家認識那一位侯朝宗了。劉啓光非常生氣。

霧峰林家有一位曾經對父親說：「臺灣人放尿攪（kiáu）沙噉作堆，有天如果臺灣人要管臺灣人的話，他就要走了」。那是一種感嘆啦，類似這樣的，我少年的時候聽他講不少這些事，從文化協會改組到陳忻與劉啓光，但現在差不多都忘了。

臺北安生堂婦產科的黃朝生<sup>90</sup>醫師，是父親在臺灣文化協會

---

見近藤正己，《總力戰與臺灣》，501-505；日治法院檔案，司訓所，昭和6年判決原本[7]，第15頁，昭和4年第579、590、598、601、645、646、648、729號。

90 黃朝生（1905-1947），臺南下營人，六甲公學校畢業後進入州立臺中高等普通學校就讀，和謝東閔與陳文彬為同學。畢業後進入臺灣總督府醫

時的同志，兩個人常在蔣渭水的大安醫院碰面，很談得來，後來他一度在延平北路媽祖宮（慈聖宮）入口處邊開業。我爸爸從臺中回來臺北，常去找他。1944年我爸爸喪偶，那時我媽媽拿到助產士資格，在他醫院裡當護士，他就安排我爸爸偷偷相親，後來就成功了這一段姻緣，所以是我爸媽的媒人。二二八事變時他擔任市參議員，參加處理委員會，爲了事件的善後積極奔走，結果被陳儀、柯遠芬等殺害，連屍首都找不到。據我媽媽說，醫師對她們非常和善，而且常和她們開玩笑，在那裏工作非常愉快。我父母親直到他失蹤後一段時間才知道，動亂平息後，打聽之下，才知許多知交老友已淪鬼域，那種心情實在不好受。

張士德住在臺中大全街的一間寬大的日本宿舍，我們1960年搬回臺中，不久父親就帶全家去拜訪。他同學高魁元當了國防部長後，請他當顧問，到國防部上班，所以全家又搬到臺北。聽說他過世前，全家都已移居到美國。二二八他所知道的事情一定比別人多，因爲他一隻腳站在抗爭者這一邊，另一隻腳又踏在官府裡，同情民間的朋友，知道鎮壓者就要行兇，卻無可奈何。他的三青團被打成黑幫，長官李友邦又被槍斃，還好沒有人找他麻

---

學專門學校就讀，在四年級時曾因肺結核療養半年。就讀醫學專門學校時，居住於蔣渭水開設之大安醫院二樓，並加入文化協會。他在畢業後進入臺北赤十字醫院任職，後回到家鄉開業。父親黃添受過世後返回臺北，於圓環附近開設安生堂醫院。其以婦產科爲專攻。曾在1933年遭到警方逮捕。中日戰爭期間一度想前往中國擔任軍醫，但遭到家人反對未能實行。戰後當選臺北市參議員，二二八事件後卻被軍警抓走，下落不明。參見許雪姬訪問，許雪姬、吳美慧紀錄，〈黃瑞霖、黃瑞峰兄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第四期（1993年2月，臺北），頁132-151；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頁134。

煩，只是升不上來，成了永遠的張大佐。

黃華山聽說父親在榮總住院，向熟人打聽了病房號碼後，跑到臺北來，走到病房門口，熱淚盈眶，居然沒有勇氣進去，轉頭就走。父親告別式他也不忍參加，後才來告訴我們這段經過。黃在政府實施三七五減租以後受損頗重，臺中市內的資產陸續賣掉，又不想住都市，到我高中時他搬回霧峰舊正村象鼻路的樹薯粉工廠住，唯一的嗜好是到附近中興新村的圖書館看書，尤其是政治歷史方面。黃常到臺中找父親聊天，看到我，就要考我俄羅斯革命的根本原因之類的政治課題，他自己研究得相當深入，只答土地與麵包是不能過關的，我痛罵貴族、地主他也頷首微笑，似乎他從來沒有擁有過土地。1990年我又找到他，他正躺在馬偕醫院，用力握我的手，說他一生最好的朋友就是我父親。

日治時期，負責監督父親的特高警察有好幾位，有一位後來和父親還成了好朋友。我們還記得1961年有一位警察自日本來看父親。另一位叫做石橋忠治的則回到臺中投資，在樹仔腳那裏開工廠。父親過世後，在1981年，有一位警察還寫了一張明信片說他已經不能走路，此生大家大概無法相見了。據我母親說，戰爭末期食物缺乏，特高到店裡來，談完公事後，父親會交代廚房炒一盤咖哩飯、蛋包飯之類的讓他們用。他們要回去時，母親會包十來個新鮮的鴨蛋給他們帶回去，因為很早開始，新高會館就拜托農民在南屯幫忙養鴨子，直接供應餐廳，所以戰爭發生後也不虞缺乏。日本人開始會覺得不好意思，但這些小東西對他們家庭實在太有幫助了，所以當第二天把包袱巾 (pau hók kin) 拿來還的時候，總是又鞠躬，又道謝，還有紅著眼睛，幾乎要掉淚的。戰爭末期，有一位還偷偷告訴父親，說父親被列入地方有力



人士的名單，如果美軍登陸，他一定要逃，因為軍部不知會做出什麼事出來；證諸後來在琉球的日本軍方殺害當地頭人，堅壁清野的一些作法，臺灣軍部有類似的計畫也許是真的。

父親的朋友有些我們不熟，但知他跟王詩琅、李曉芳、李振芳、陳其昌，<sup>91</sup>這幾個人都有來往。他過世前一年還和一些老朋友一同去陽明山，這些老朋友被關的時間加起來大概有一百年，吃飯時，我也在，罵起國民黨每個人中氣十足，喧譁吵雜，不輸初、高中學生。這裡面還包括有周合源<sup>92</sup>（曾任臺北市議會副議

91 陳其昌（1904-1999），新北市汐止人。1920年後赴中國就讀杭州第一中學。「五卅慘案」發生時曾以該校學生代表參加抗日運動。畢業後就讀上海大學。在師長鼓勵下轉往東京就讀日本大學政治學部。在日期間，與廖承志等留日學生參加「社會科學研究會」及其他活動。後被日本當局發現其為臺灣學生，而於1929年遣送回臺，再參加蔣渭水領導的抗日運動，並擔任民眾黨的主幹（秘書長）兼組織部長。在臺灣民眾黨遭到解散後，他前往中國，原先於廈門，後轉往江蘇。在廈門經營「廈南公司」、「中和牧畜」公司。曾當選廈門臺灣居留民會議員。在江蘇時則在《江蘇日報》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陳其昌加入上海臺灣同鄉會。1946年返臺。1947年目睹二二八後與同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好友李萬居等成立《公論報》，並由其出任總經理。1953年因《公論報》員工黃培奕為張志忠所領導之省工委成員向情報機關自首，並供陳其昌三次資助其資金共一千元，陳其昌因此以「資匪」罪名遭當局重判無期徒刑。直到1975年方得假釋，前後遭關押22年之久，1986年陳其昌創辦《遠望》月刊雜誌，任發行人兼社長。臺灣總督府警務局，《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頁476；《臺灣歷史人物小傳--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年）頁514-515；許雪姬，〈1937-1947年在上海的台灣人〉，《台灣學研究》，第13期（2012年6月），頁15；王曉波，〈但悲不見九州同敬悼中國統一聯盟名譽主席陳其昌先生〉，《海峽評論》110期（2000年2月），頁31-36。

92 周合源（1903-1993），臺北萬華人，父親育有六子一女，居次。1913年進入公學校畢業後就讀該校高等科，但因家境問題進入郵局半工半讀，

長周財源的哥哥)，還有他在獄中結識，出獄後結為連理的許月里<sup>93</sup>女士。周合源和許月里夫妻是父親的好朋友，父親過世後，他們還到臺中看我媽媽幾次，有次許月里回憶被關了12年的辛酸，不禁流下眼淚。許月里幾乎是以我爸爸為偶像，常說他年輕時演講與帶領群眾運動的領袖的風采，但看到他晚年病魔纏身，又因車禍不良於行，她堅持父親在1977年被一個少年騎摩托車撞倒，一定是國民黨安排、製造的車禍，雖然我告訴她肇事者是個十七、八歲的工人。他們兩位到老還在為工運發聲，也是統派，但也都無損他們和我父親的感情。2001年，我和妹妹到

---

因故未能畢業，但他利用課餘時間，晚上就讀成淵學校夜間部就讀。1922年他和陳玉英等人創立「慈惠夜學義塾」，免費替無法就讀的青少年補習。1924年他一度前往東京進修學業，返臺後入「愛愛寮」工作。他曾加入由稻垣藤兵衛組織的「孤魂聯盟」，宣傳無政府主義和無產階級解放。他在1930年被推舉為文協中央委員，並參與《伍人報》，雖一度遭到逮捕，但後判無罪。1938年前往北京，1946年回到臺灣，在大同公司擔任秘書。1953年他被以「資匪」和「知情不報」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1965年出獄。1980年代他積極為黨外人士助選，並成為民進黨創黨黨員。他和元配育有一子平和，後再娶政治受難者許月里為第二任妻子。參見陳翠蓮、薛化元纂修，《續修臺北市志·人物志（政治與經濟篇）》，頁113-114。

- 93 許月里(1912-2008)，臺北新店人，家中原以種茶為業，後搬遷至臺北後火車站。因家中經濟問題，10歲方就讀公學校。曾參加過臺灣文化協會舉行之讀報社或演講活動。1927年公學校畢業後，考取臺灣銀行儲蓄部雇員職位，後加入已經左傾的文協，並在友人帶領下接觸到薛玉龍、薛玉虎成立之工友協助會。她居中協助會務和推廣婦女運動。戰後初期，因對簡吉、廖瑞發等人提供經濟援助而遭到逮捕，被判刑12年。出獄後仍持續進行社會運動，並加入中國統一聯盟與勞動黨。她一生有三段婚姻，第二段婚姻有一子榮光。1970年和同為政治受難者周合源結婚。參見陳翠蓮、薛化元纂修，《續修臺北市志·人物志（政治與經濟篇）》，頁205-206。

她北投中和街家探望她，她還大罵李登輝和臺獨，用語很坦率，精神奕奕，那時應該 80 多歲了。曾得志以前住我們臺北的家附近，寧夏路上，他戰前參加過社會運動，但我聽父親說他被抓的罪名，只因借錢給二二八或白色恐怖被通緝的逃亡者而已。王詩琅住在艋舺江町，父親過世時，我親自送訃聞給他，他並帶我到住他家後面的康寧祥家去，請他幫忙在告別式中幫我父親做生平介紹。

在臺中，我父親有一段時間常騎腳踏車去太平鄉找楊基先聊天，也會載二姊和我去，記得種很多果樹。楊是第一任的臺中民選市長，而且是黨外，大概在任時做得很辛苦，卸任後則不管政事，但父親去找他時，兩人都會一起罵國民黨。父親在世最後兩、三年常來家聊天的有范政佑、何開山、陳文輝等。范到被抓送司法審判那天早上，還在我們家與我爸爸聊天，我打電話回家時，也告訴他國民黨追訴範圍可能會擴大，他哈哈大笑，說管他的，反正現在我還好好的，但那天下午國民黨就動手了。張深鏞<sup>94</sup>是臺中有名的牙醫，我們家小孩牙齒有問題都是找他，他和

94 張深鏞 (1901-1995)，臺中大雅人。赴日留學東京齒科專門學校，在校期間參加「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畢業後返回臺灣，於臺中開設「昭和齒科醫院」，參與臺灣文化協會活動。臺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時也參加活動。1935 年當選臺中市議會議員，共擔任兩屆。也參與中央書局營運，擔任董事長。日治時期擔任臺中州的齒科公會會長，戰後臺灣省齒科公會成立後持續擔任該會理監事與第四屆理事長直至退休。二二八事件前幾甫加入張邦傑成立的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臺中分會，事件發生後加入設立於臺中省立圖書館的「治安處理委員會」，任財務，負責向外募捐，以支付收容外省人的生活費用。事件後被捕送整編第二十一師，輾轉送到軍法處與臺中地方法院，因參加治安維持會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但判緩刑，關押 4 個月之久。參見黃秀政、許雪姬訪問，許雪姬、連偉齡

何春木、我父親，是那時臺中黨外的領袖，有好幾年，農曆正月一日早上，黨外朋友都到他在中山路的「深鑄牙科醫院」拜年聚會；何開山是臺中的老議員，他和張醫師在稍早時都是溫和的反對派，但參與和關中他們的溝通之後，卻變得激烈，美麗島事件以後，罵國民黨政府，更是口無禁忌，可見一般人認為，人年歲增長會變得較圓融、保守的說法並不一定對。陳文輝那時在太平鄉開一家自行車工廠，和黃越欽、關中他們有點熟，所以常參加黨外溝通，太平鄉又離我們那時住的進德路近，所以他常常來家裡陪父親。

父親過世前幾個月，曾到監獄去看美麗島事件司法被關的幾個人，包括范政佑、李明憲等，但其中他最欣賞陳博文，因會面種種限制，只能隔了遠處揮手致意，後來陳也以此情景為題從獄中作了輓聯來弔念，文句我特別抄下來，可惜現在找不到了。

我青年時非常叛逆，就讀臺中一中時為了一些小事主動去找導師、教官的麻煩，視此為樂。父親警告我，不要以為教官對我無可奈何，就繼續生事。臺灣人與外省人個性上的差別與地理環境或有關係。臺灣人平常溫吞馴服，如這裡的溪流，天氣晴朗時，流水嗚嗚咽咽，但一旦下起大雨，水流馬上占滿整個河道，淘盡泥沙，滾動巨石，咆哮下沖，就像臺灣人遇到不平終不能忍，不管後果，一定要拚個你死我活。外省人則如長江流水，平時緩慢流動，下雨亦不多增，看似平和，但水深不可測，水下有漩渦、急湍，從岸上看不出來，陳儀、黃克立一班人就是如此。

臺灣人以爲雨過天青，事情已告段落，不知道要躲、逃，結果身受滅頂之禍，這就是二二八。

